



史良
自述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史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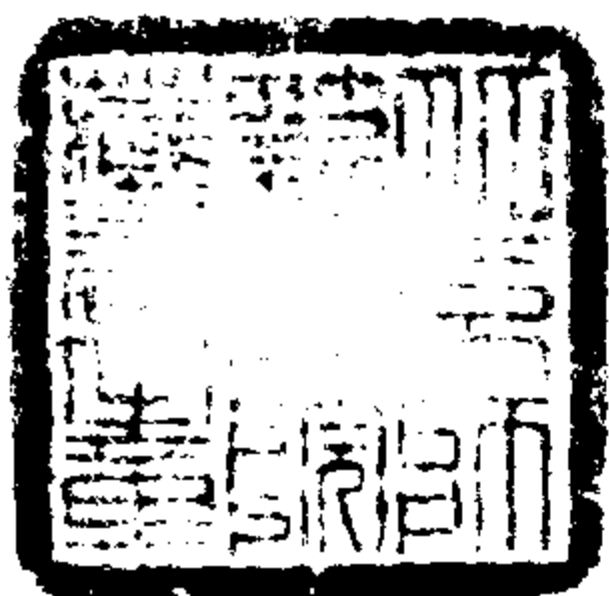
自述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9647

中国文史出版社



1119647

目 录

一	童年	(1)
二	女师学潮	(3)
三	初入社会	(6)
四	律师生涯	(8)
五	营救邓中夏	(10)
六	政治案件	(13)
七	妇女案件	(15)
八	参加妇运	(17)
九	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	(20)
十	赴南京请愿	(24)
十一	救亡运动进入了高潮	(26)
十二	山雨欲来风满楼	(29)
十三	深夜被捕	(31)
十四	在苏州监狱中	(33)
十五	法庭上的斗争	(36)
十六	入狱运动	(39)
十七	形势急转直下	(41)
十八	我深深怀念他们	(43)
十九	参政员生活	(45)
二十	和宋美龄在一起工作	(48)

二十一	参加民盟·····	(51)
二十二	民盟的改组和初期工作·····	(53)
二十三	一九四五年的形势·····	(57)
二十四	旧政协·····	(59)
二十五	国民党破坏旧政协·····	(62)
二十六	李闻血案·····	(64)
二十七	在国民党悍然召开伪国大以后·····	(66)
二十八	民盟被迫解散·····	(68)
二十九	民盟历史的转折点——三中全会·····	(70)
三十	解放前夕·····	(72)
三十一	天亮了·····	(74)
三十二	解放以后·····	(76)
三十三	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	(80)
三十四	新的春天·····	(83)
三十五	美的赞歌·····	(85)

一 童 年

我是江苏常州人，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常州是江南的一个小城，邻近苏州、无锡。南朝梁人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所说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就是指的这一片地方。我的幼年生活是在这美丽小城中度过的。

我出生于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我的祖父和我的外祖父，都是前清的进士。我的父亲由于反对科举制度，故始终没有入考，没有做官，因此我家生活很清苦。我有姊妹八人，全靠父亲以教书的微薄月俸供给，经常吃不饱饭。还记得幼年时，父亲曾以“两袖清风，一窗明月”来形容自己的淡泊生活。我的母亲很能干，是一位贤淑的女性。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做主妇是很不容易的，她每年冬天都要用大缸腌上一缸咸菜，每天吃饭的时候，切它一点就饭吃。至于营养，那就谈不到了。由于营养很差，孩子们常常有病，但家境贫寒，有时有病也无钱医治。在这个情况下，我的二姐死于浮肿，三姐死于肺病，七妹死于肿瘤，她们死时都很年轻。

幼年时代，我从自己的家庭和一些穷亲戚那里看到中国人民的苦难，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苦难。在我们亲戚中，有一些农民，他们的悲惨生活，曾在我的幼稚的心灵上留下深刻印象。我在童年时期，从父读书。我那时所读的书主要是四书五经，此外则是诸子百家。我的父亲历史知识很渊博，常给我们讲述历史故事。

他给我们讲过屈原、文天祥、史可法、洪秀全等人的经历。这些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的父亲最反对曾国藩，说他助满反汉，是民族罪人。这些，对我日后的思想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我父亲的性格很倔强，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吧，我从小就富于反抗精神。在我还未成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就想把我订亲给一个姓刘的人家。这家很有钱，但我不愿意。在他们把我的生辰八字送给刘家以后，我就蒙头睡觉不吃饭，和父母赌气，父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把生辰八字要回来。我的倔强的性格，在后来的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到十三岁的时候，才进正式的小学——常州女子师范附小读四年级。为什么到十三岁才念小学呢？原因就在经济问题。在我十三岁那年，大姊开始参加工作，家庭内有了两个生产者，父亲的负担得以减轻。我在小学毕业以后，又考入常州女子师范。这时由于全家经济情况略有好转，我的另外两个姊妹也进了学校。

那时，男女是分校的。男女分校有许多不好的地方，虽然“授受不亲”的观念被打破了，毕竟还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影响。男女分校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它锻炼了女生，免得一切事情都被男同学包办。我在常州女师附小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学校的活动。有一次带头闹学潮，赶走了一个不学无术的算术教员，以致被记大过一次，但却获得了同学的拥护。

二 女师学潮

我在小学毕业以后，进了女师本科。女师在当时的常州算是最高学府之一了，与它同样地位的，则有武进男子师范学校和江苏省设在常州的第五中学。女师的生活是很愉快的。那时从全国来说，女子学校还不多。女子念洋学堂，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性的行动，它是当时社会上风行的女权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回忆女师生活，有一件事最令我难忘，就是学潮事件。当时的一位校长极端颞颥无能，同学们都不满意他，想把他赶走，决定举行一次罢课示威。我是该校学生会会长，对罢课一事起初犹豫，后来则勇敢承担起来了。在那次行动中，我们先向劝业所（相当现在教育局）请愿，后来大闹县公署，包围县长达三小时，围困劝业所达十三小时，声势很大。由于罢课理由正当，同学们团结一致，终于取得了胜利。如果说，这也算“政治”的话，那么，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参加较大规模的政治行动了。

在女师生活中，更令我难忘的则是一九一九年配合北大学生参加五四运动。那时北大学生首先发起了爱国运动，主要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收回战前德国侵占山东一切利益，取消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卖国的“二十一条”，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义旗一举，立即得到全国各校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常州学生也掀起了一个规模浩大的罢课运动来支持他们。常州有好几所中学，为了便于统一行动，这几所中学就

联合到一起，成立了全县学生联合会。我原是武进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会会长，这时便兼任了全县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和学联的评议部主任，参加全县学生的爱国行动。我们的学生联合会设在县文庙的明伦堂内，经过同学们热烈讨论以后，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立刻得到各校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实现了全市的罢课。接着学联又把同学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宣传队，分别到工厂、农村去宣传，开展一个群众性抵制日货运动。我们学生自己带头把家里的日货带到学校里去焚烧。市民很同情我们。事情弄得很大。这就触动了县府的那班老爷们，他们联合常州县的一些士绅，密谋拟订了一个扼杀学生运动的根本办法，就是停办中学。有一天，我去上学，忽见学校门口挂了一个小木板，木板上写着三个大字：“停办令”。停办令的全文则贴在木板下端。同学们见了，十分气愤，就把它撕下来找校长去评理。校长说，这是劝业所决定的。于是我们就一齐找到劝业所，指名要见所长徐化吾。我们学生人多，又是七嘴八舌，高呼口号，徐化吾怕得不得了，只得推说，“这事是县衙门决定的”。我们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立刻掉头来到县府，指名要姚知县接见。那位知县不知是真不在还是不敢见，没有出来见我们，见我们的是他下面的爪牙。这些爪牙当众大声宣布要捉学生，我也就大声叫道，你们要捉就捉吧，我们自己送上门来了。争执一番以后，我们坚持要姚知县亲自出来，他还是不露面。我们大家气极了，就把他那公堂上的长桌掀翻，把审签撒了一地。县衙门赶紧加兵加岗，并找来八个士兵手持大刀，对准我们学生。我就高声对士兵们说：“我们的行动是爱国的！军阀是卖国的！你们千万不要上当，去给军阀当走狗。”说完以后，就和大家一起冲上

去。这一下把徐化吾可急坏了，连说有话好商量。他满脸堆笑地说：“请大家先吃饭，吃了饭县知事也就回家了，那时再好好谈谈。”于是我们大家就去吃饭等候。哪知到了晚上，县知事竟把我的父亲捆绑到县衙门来，声色俱厉地威胁我的父亲，说我是带头闹事的，要他把我带走。这事被同学发现了，于是我们一涌而入，去责问那位知事，知事大出所料，狼狈不堪。我向他严正地说：“我们学生为学校停办的事来找你，你把我的父亲抓来干什么？”县知事赶紧诡称：“不是抓来，而是请来谈谈。”他先是语言支吾，后来终于理屈词穷。在强大的学生队伍面前，县衙门终于收回了停办学校的命令。这场斗争就此取得胜利。

斗争胜利以后，我和另一同学受大家委托，代表常州县的学生到南京去请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群众斗争。它鼓舞了我，使我认识到群众的力量。

那时正是思想战线上激动人心的年代。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以科学、民主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兴起。千千万万的青年被这个伟大时代的浪潮所吸引了，我也被它吸引了。我常常贪婪地阅读当时流引的书刊，如《新青年》、《改造》等等，还有一些反映新思想的小说，记得有一本叫《夜未央》的作品，当时曾给我带来很大的激动，隔了多年还印象很深刻。

三 初入社会

一九二三年，我考进了上海政法大学，攻读法律。这所学校是由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徐谦创办的，曾经培养过不少的法学人才。我进的是该校的第一期。在校期间，我们参加过不少学生运动，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参加抗议五卅惨案的示威游行。我们在游行时喊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以致被捕。

上海是个大城市，北洋军阀的统治手段比常州高明得多。加之群众力量很大，所以我们只被关了一天，就在当日释放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捕。虽然被捕，却没有坐牢。事件以后，政法大学学生会创办了一个刊物，名叫《雪耻》，由我主编，主旨是宣传民主独立，反对列强侵略，虽然它只是一个学生刊物，但在当时的学生界中，却也起过一定的影响。

我在政法大学学习期间是半工半读，除读书以外还做一些零星的社会工作，以所得报酬贴补个人生活之不足。我认为，半工半读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工作能力，也可让学生了解生活之艰难，是一种很好的校外教育。尤其是文法科，半工半读更可以帮助学生早点接触社会，了解社会。

一九二七年，我从政法大学毕业后，怀着天真的幻想进入社会，要为社会做些贡献，为国家的振兴尽一分力量。但现实生活是残酷的。社会迎接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如何发挥个人才能，而是就业难。那时我国民族经济不发达，社会就业的容纳量很小，

学生毕业往往就是失业。我毕业以后，找不到适当工作，不得不放弃法律专业，到一个行政单位去做事。那个单位的负责人姓刘，是一个国民党的官僚兼党棍，十分讨厌。我和他不久就发生了矛盾。当时正是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政治气候极坏，反动派的气焰正在嚣张，而我只是一个阅世未深的女青年，和这样一个家伙对立，当然没有好结果。这时我已开始感到做人处世之难，但我的不肯屈服的性格却使我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忍耐，当面顶撞了他。这个姓刘的家伙很坏，竟以思想问题的罪名把我逮捕了。在那黑暗的年月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上每天都沾满着革命者的鲜血，象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人，被他们关起来，算得了什么呢！

我被捕以后，就被关进监狱，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监牢。与我同时关押的，有不少人是共产党员，他们有的被关押三四天以后，就执行枪决了；有的虽然没有判死刑，却受尽了折磨。这次坐牢使我惊异地看到中国监狱和中国司法之黑暗，倒庆幸有此难得的实地考察的机会。我当时并没有任何党派关系，但初生之犊不畏虎，却以与革命者同时被捕为光荣，曾做过一首诗，以革命者自许，表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憎恨。诗的原文现在已记不清楚了，大意是：一个正直的人，是有高尚情操的，宁可冤屈而死，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同恶势力妥协。这首诗后来被国民党的吴稚晖看见了，更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员。我在监狱中被关押了两个多月以后，终因证据不足，由蔡元培先生保释。这时我已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反动官僚的丑恶，感受到生活的艰难，认识到斗争的艰苦，从天真的迷梦中惊醒了。

四 律 师 生 涯

我执行律师业务，是从一九三一年开始的。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参加政法大学一位老师董康所设立的事务所工作。我的业务开展得很顺利，这里可能有些偶然因素吧！我的第一个案件是一桩民事纠纷，一家大公司倒闭了，债权人很多，在法院判决该公司破产以后，所有债权人都希望自己的债款得到偿还。究竟应按什么顺序偿还呢？我的当事人是一位地产商人，我援引国民政府民法第五一二条，指出土地是工商业活动的基础，兴业是如此，破产赔偿也应按此顺序，不想竟然胜诉，得到报酬五百大洋，我把这五百元钱送到我的母亲面前，她含着眼泪嘉许我：女儿已经为家庭经济分忧愁了。那时我的家境还很困难，突然收入五百大洋，确实是全家的一件大事。难怪操劳一世的母亲那样高兴了。在我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我深深地怀念母亲，她在生命的征途上走过多么漫长的艰辛道路啊！她是勇敢的，而我则从她那里接受和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在旧社会，律师是自由职业。很多人选择律师做职业，目的是要主持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但在实际上，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我知道，在律师界中，有不少朋友曾为无辜者的受难而向旧社会的黑暗势力作过许多斗争，但却不可能触及那个基本制度于分毫。他们的工作虽然是可敬的，但却是无济于事的。

在我执行律师业务的二十年间，亲见到旧社会黑暗势力的魔

掌，不断地伸向善良的人民，我经常和那些呻吟在黑暗势力压迫下的苦难的人民。一同痛苦，一同斗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有着深刻认识。尤其是政治案件，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下，国民党反动派无辜残杀了无数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了扑灭进步力量的革命火种，反动派甚至用镪水把革命者的全家活活烧死。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滔天。但另一方面，革命者的战斗精神，也鼓舞着人们，他们宁死不屈，浩气长存，给后继者以极大的鼓舞与振奋的力量。

解放以后，当我和同志们谈起以往这段律师生涯时，大家曾议论过这样的问题：究竟怎样看待旧社会的律师工作？律师的工作无非是受代理人的委托，起诉和辩护，在法庭辩论中“进攻”和“防御”，不言而喻，它是以旧法为依据。从这个意义上看，旧社会的律师是否可认为是旧法的最忠实的卫护者呢？这个提法把旧社会的律师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对这个问题另有一种看法。我认为，旧社会的法律，不管它多么堂皇，归根到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因此，它所维护的一条基本原则，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什么“严明”、“公正”，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在旧社会，任何一个高明的律师也不可能改变当时法律的根本性质。但这并不等于说，律师只能做法律的奴隶。因为任何法律都不可能严密到任何情况都能适用。实际上，资产阶级法律充满矛盾，我们在旧社会做律师，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复杂的条文结构，利用矛盾，寻找机会，去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申诉冤屈。我在旧社会的律师生涯，正是抱着这样一个宗旨，努力去做的。

五 营救邓中夏

下面这件事情是我永远难于忘怀的。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早晨，我还没有起身，就有一个人到辣斐德路辣斐坊一号我的住宅中来，要求见我。这人自称来自法租界巡捕房，他交给我用草纸折好的一封信，信内说，我因冤枉被捕，请史良律师速来巡捕房接见。具名施义。草纸包着两块银元，并写明请代给送信人大洋二元。我当即去嵩山路巡捕房和他见面，我交给看守他的华籍巡捕大洋三元，叫他给弄点水喝，巡捕会意就走开了。施义对我说，我担负着重要工作，请设法营救。他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但却以十分信任的态度相托，使我十分感动。我当即问他，有什么证据落在他们手里没有？施义说没有，只是因为走错了房屋，才被错捕的。我当即告诉他，我已决定接受这个案子，并叮嘱他，在法庭传讯时务必什么都不要承认。

会见施义以后，感到责任重大，而我毕竟年轻，就去找我的老师董康研究这案子应该如何进行，才能取胜。董康分析说，这案子是能够取胜的，因为事情发生在租界。外国人办案，是重证据的，当事人既然没有什么把柄被抓住，即使有重大嫌疑，他们也只能无罪释放，但一定要在租界内审理。我觉得董康的话很有道理，认识到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于决不能转到租界以外，而应在租界内审理。我遂即去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律师休息室，找到法租界捕房律师顾守熙，对他说：施义是冤枉的，毫无证据，无

论如何不能把他引渡到华界。若到华界，他们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漏网一个”，这人就要冤枉了。并说，这个案子是我和董康大律师办的，请他关照。他当即答应帮忙。

当天，此案就开庭了，上海市公安局派人来说，此案与另一案子有牵连，那个案子事出华界，因此要求引渡到华界办理。我事先早有准备，当即说明此案发生在租界，公安局事先没有请求法院出拘票就把人捕来了，这是不合法律手续的，而今又请求引渡，更无法律根据。于是法庭三人退庭，举行评议会，会毕重新开庭，法官当场做了不许移递的中间裁判。我们认为这是取得了初步胜利。哪知过了几天，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院长梁仁保到董康律师事务所来谈，才知道蒋介石已亲自下了手谕，强迫法捕房把施义移递到南京去了。当时作过中间裁判的庭长为此被记了一个大过，承办推事也受到了处分。施义先生在被移递到南京以后就被枪决了。在他殉难之前高呼口号，英勇不屈。事后我才从宋庆龄大姐那里知道，施义就是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先生。

从此我就开始为中共地下党员作辩护律师。每逢发生被捕事件，就尽力营救。在这过程中，我荣幸地结识了我所敬爱的宋庆龄大姐。那时，宋大姐已从苏联回到上海很久了。由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不断地迫害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形成最反动的法西斯统治，于是一些左派国民党人和正直的社会贤达以及广大知识分子，都对国民党产生强烈不满，而疯狂的刽子手却仍在不断残害人民。在这形势下，宋庆龄大姐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先生发起组织了民权保障同盟，宋大姐被推举为同盟的主席。民权保障同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被国民党迫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

士。由于这个缘故，我得以经常聆听宋大姐的教导，宋大姐介绍给我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属于上述内容的政治案件。她也给我介绍过不少的妇女案件，她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妇女领袖。

六 政治案件

由于办理地下共产党员的案件，我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互济会建立了联系。为了方便，上海地下党指定互济会的一个负责同志在我的律师事务所内任帮办。这位同志一直和我配合得很好，而且始终保守了机密。

当时，通过互济会介绍来的案件相当多，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中共党员任白戈的案件。这个案子是一九三三年办的，它的特点是严重而紧迫，但办得迅速而麻利。

那是一个夏天，上海互济会的负责人告诉我，任白戈因共产党员的嫌疑而被捕了，有特殊理由必须紧急营救。我接受了这个案件，担任他的律师。首先设法找到法院方面的熟人，托其向警察局方面了解案情。回话说，任白戈是在中国地界被捕的，被捕时警察局掌握的证据并不充足，现正到处搜集证据。我听了以后，知道此案相当紧迫，因为凡在中国地界被捕的，国民党特务往往不经司法程序，秘密处理。如果转到特务手里，就既不能出庭辩护，又无法前往会见，甚至连关押在哪里都可能不知道，情况十分危急。为了达到营救目的，我和一个法律界的人商量以后，决定出奇制胜，先托法院查到此人关押地点，然后直接通过法院人员公开向警察局提出，说此事是误会了，望允许保释。当时警方确实没有掌握证据，而只把他做为一个思想左倾分子，未予重视，既是法院方面熟人提出，落得卖个面子。这次营救是采

取快速战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转到特务手里的时候，先解决了问题。在历次案件中，这次最为大胆，是别开生面之举。警察局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案件的重要性，更没有想到我们竟敢于采取如此直接方式营救重要人物，而把他释放了。更有趣的是，与任白戈同时被捕的，还有另一位地下党员，警察局认为，既然任某不是重要人物，此人亦必不是地下党员，次日就把他也释放了。

我所记得的，还有一桩熊氏兄弟的案件，这个案子的处理，亦有其奇特之处。案件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出事地点在法租界内。熊氏兄弟确系共产党员，他们是被党内的一个叛徒出卖而被逮捕的。若是当面对质，熊氏兄弟必无生理。但除人证之外，却无任何物证，因此法巡捕房正在踌躇。我在接受本案以后，第一件事是托人打听告密人姓名，打听到以后，就通知了中共地下组织。他们后来证实了那个叛徒的情况，通过“打狗队”果断地把他清除了。人证既除，本案的关键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此时恰巧法巡捕房正用刑逼讯熊氏兄弟，我使用律师身份提出，警方用刑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要求立即移送法院，开庭审理。法巡捕房不得不将熊氏兄弟移送法院。法院审理时，由于人证已不存在，无从对质，此案只得以嫌疑分子无罪了结。当时这类案件甚多，证明那时斗争之复杂。

七 妇女案件

我所办理的案件，除了政治性的以外，就是妇女案件，其中较多的主要是婚姻案件。通过办理这些案件，我认识到中国妇女的苦难。正象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妇女除了身受三座大山压迫以外，还要受夫权的压迫。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案件，一位劳动妇女，子女很多，家境困难，而她的丈夫一点也不体谅她，还经常打骂她，有时丈夫喝醉酒回来，把她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她实在忍受不了，向我诉说她的冤情，要求以不堪虐待为理由同丈夫离婚。这位劳动妇女自己有工作能力，在纱厂当工人，她的要求是很正当的。但后来经亲友劝解，官司没有打成，哭哭啼啼地回去了。以后她的丈夫是否还继续虐待她，就不知道了。象这样类型的案件还很多，总的特点是受男人虐待，苦不堪言，要求离婚，以解除夫权的束缚。具体到每个案件，又各有特点，有些情节比较复杂，但从根源上看，都是因大男子主义而引起，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在旧社会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只有到了新社会，男女在法律上和社会上都确实平等了，并且妇女有了经济地位这个基础，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虽然如此，实际上仍有许多情况说明，即使解放以后，夫权还没有被彻底打倒，这是因为旧社会遗留的意识形态，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清除干净的缘故。

在妇女案件中，还有一起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姓名这里不

提了。这位妇女是一个穷困的女性，被一个男人骗了，生下孩子以后才知道这个男人早有妻子。这位妇女很美，但文化程度不高，每天到我家厨房门口哭泣，我家厨房的阿姨问她为什么天天来哭？她才说出她的苦情，阿姨就来告诉我，我让她进来谈谈。在我了解到全部情况以后，就决定义务替她辩护，并请她和我同进午餐。后来她在法庭上取得了胜诉，男方答应按月付给生活赡养费用，虽然如此，妇女仍然是吃亏的。还有一起妇女案件，也是印象深刻的。委托人是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她控告的对象是一位有妇之夫。这位有妇之夫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头面人物。这位头面人物过去就闹过婚姻问题。他在这类问题上被妇女控告，已不是第一次了。这人一方面和我的委托人有超过朋友的关系，并且有了孩子，另一方面又与另一女性发生了关系，正在议论嫁娶。这个案件最后是通过调解解决了。我的当事人虽然得到了经济上的赔偿与赡养，但她在心灵上的创伤，却是永远也不能得到补偿的。我在解放以后，曾见过这位妇女，那时她已年近五十了。她说，她从此没有再结过婚，而只把她的精力用在教育孩子身上。

八 参加妇运

在我刚刚三十岁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几个月，即一九三二年的三八妇女节，上海各界妇女在北四川路的青年会举行了一次庆祝会，很多妇女界的人在会上讲了话。其中有一位，不记得她的名字了，竟在大会上讲了一大通的“混话”，说什么妇女只要做好家庭主妇，要帮助丈夫，搞好和睦家庭等等。我那时还很年轻，有些忍耐不了，就跳上台去，讲了一通话，批评了那位妇女。我的话大意是说，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中国妇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须是我们的民族首先得到真正的解放。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不可能的。我讲话以后，姊妹们热烈鼓掌，一位男同志还跑到我面前来向我祝贺。这位同志和我认识以后，常来同我联系。他就是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陈家康同志。我们的呼声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在会后游行时，上海市的国民党当局竟然出动军警弹压。他们用木棍殴打游行群众，许多姊妹都受了伤。这是我离开学校以后第一次参加群众性的爱国斗争，这次斗争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从此，我就参加了上海妇女界的各种社会活动，并认识了许多妇女界人士。我除了继续办理妇女案件，为她们积极辩护以外，还参加了一些妇女的集会。那时，上海有不少刊物，如《申

报》的妇女副刊、《中国妇女》、《妇女生活》杂志等，我不仅经常阅读它们，并且自己也撰写过稿件，这使我和上海文化界也开始有了一些接触。

上海的妇女是非常爱国的，这同上海妇女常受外国人的欺负有关系。记得当时有一个日本人开的纱厂叫裕丰纱厂，发生过一件惨无人道的事件，至今印象深刻。厂里有个女工，一天在休息的时候，偶然提到工人罢工的故事，恰巧被一个工头听到了，立刻就被五六个工头拖出去加以毒打，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工头把这女工的尸首装进麻袋，藏在桶子间里。这件事只有在场几个工人知道，但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一直到一个星期以后，另一个女工到桶子间拿桶子，看见麻袋里露出一只手，吓坏了，就大嚷起来。工头听到了，不但不予处理，反而把她拖出去，问她干嘛大叫大嚷、让所有工人都知道这个事，接着就拳打脚踢，把她关进一间黑屋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放出来以后，这个女工的养母也警告她以后不要多管闲事。这件人命案子不久传开以后，引起全厂工人的愤怒，但对日本老板也没有什么办法。在女职员中，中国妇女同样地受日本人欺负，她们的职业无保障，一些人人身受到污辱，常常是有苦难言。由于上海妇女受日本人欺负比较厉害，所以对抗日救亡运动最积极。

一九三五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继侵略我国东北之后，步步进逼，向内蒙、华北进兵，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反动政府一面执行投降屈辱的政策，一面加紧进行疯狂的反共内战，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白色恐怖中。亡国在即，全国却象死一般的沉寂。为了打破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在八一宣言的影响下，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北平学生发动了两次示威游行同军警冲突，喊出了共御外侮的口号。就在这时，上海的爱国救亡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走在运动前列的上海妇女界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这个救国会是由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和我共同发起的。它是上海市的第一个救国会组织。在成立会上，我被选为妇女界救国会的理事之一。从此，我就从一般地参加妇女运动，转为全面地参加救亡运动了。

这时我已三十五岁，开始从青年步入了中年。

九 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

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是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成立的，开成立会的那天，姊妹们兴奋极了，有人前一晚就没睡觉。在这前两天，上海复旦大学和全市大中中学生八千余人，曾冒着寒风连夜游行，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并在游行中呼出了“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为了支援他们，“妇救”也举行了游行，并发表了宣言。

那时，上海文化界人士为响应中共八一宣言而进行了许多串联活动，这些串联活动最终形成了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有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钱俊瑞等文化界人士二百八十余人。宣言指出：“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履。”必须早日奋起，争取民族解放。宣言提出了八条主张，其中心要求是出兵抗日，保证人民基本自由权利。宣言发表以后，立刻在知识界和青年界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在这个形势的推动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当月二十七日成立，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顾名、沈兹九等三十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

当时，邹韬奋正在编辑《大众生活》周刊。这个周刊，是继续《生活周刊》、《新生周刊》而出版的群众性时事政治杂志。

《生活周刊》由韬奋主编，因发表支援福建人民政府的文章而被

勒令停刊；《新生周刊》接替了《生活周刊》，由杜重远主编，又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得罪了日本帝国主义而被禁止，杜重远因而坐牢。《大众生活》是继《新生周刊》之后出版的。在发刊词中，编辑部宣布自己的宗旨就是冲破重围，用人民的力量作自救的斗争。刊物申言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这样，《大众生活》就成了救亡运动的喉舌。任何一个群众运动都必须以宣传工作为前导，以鼓舞群众的热情。《大众生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这一任务。由于它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喊出了中国人民的呼声，说出了广大基层劳工、青年和市民的心里话，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每期销数达二十万份，打破了中国杂志界的记录，风行全国，流传广泛。由于它的字字句句都是射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弹，因而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朝中妥协投降主义者的强烈憎恨。这一切都是无可避免的。《大众生活》以及它前后几个刊物及其主编人的政治遭遇都说明了这一点。

紧接着上海妇女界和文化界救国会的成立，上海职业界、学生界、教育界的救国会也相继成立了。在各个专业救国会组织的基础上，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救联一成立，便宣布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提出了“团结御侮”、“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很快就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的一致口号，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口号。

由于上海救联是以各专业救国会为基础建立的，因而它的执行委员也都是各方面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其中包括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沈兹九、张

志让、顾执中等。

上海救联成立大会借用上海总商会的礼堂举行，会开得很隆重。由于那天正是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所以会后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走上大街以后，就吸引了许多市民中的同情者参加了队伍，以致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情绪也愈来愈热烈。路上大家高唱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行列十分壮观。直到江湾淞沪抗战烈士墓前献了花圈以后，队伍方才散去。这次大游行在上海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震动，是一次重大的群众性政治活动，它的效果远远超过了我们原先的预料。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震动了全国。当时有影响的进步刊物都发表了上海救国会的宣言，使它传遍南北各地。一九三六年形势有发展，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侵略气焰嚣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上海救国会同仁即联合华北、华南、华中等二十余省的爱国救亡组织，于五月三十一日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宣言和政治纲领，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目的是要灭亡我国，我们的唯一自救之路就是团结一致，奋起抗战。并明确指出：国民党“以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任务，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而国民党目前的错误则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一掷”。宣言宣布自己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求民族解放”。大会选举了宋庆龄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我也是其中之一。从此，我和救国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以后的政治活动，全都和救国会不可分离了。

那时，我们常在功德林集会。功德林是上海的一家素菜馆，

为什么在那里集会呢？原因是找不到会所，而功德林却有熟人，并且在功德林吃饭比较便宜。当我现在回忆起以往的经历的时候，还记忆犹新地记起这家素菜馆。

十 赴南京请愿

救国会成立以后不到两个月，国民党于七月份召开了二中全会。这次全会在当时形势下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大家对会议的动向都很关心。为了推动这次全会能在抗日的步骤上更进一步，而不致走向反面，我们推派了几个人到南京去请愿，其中有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和我。我们是七月九日乘夜车离沪出发的，十日晨抵南京，在南京呆了四天。十三日那天，我们到了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会场，向大会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要求大会准许我们代表团向大会代表直接表达我们的意见，只要五分钟就可以了；第二，要求大会作出决议，立即抗日；第三，要求大会议决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释放政治犯；第四，要求停止内战。记得大会代表来接见我们的是马超俊，马超俊讲话很油滑，除到会发言五分钟这一点，他表示大会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人民代表不能列席，其余各点均表接受。对于抗日，他说他自己就是抗日的，政府也是抗日的，但却又说人民不能随便拿抗日来与政府为难；对于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他说本来就没有压迫，如果地方上有压迫，各地救国运动都可来南京开会，但又说，人民不能以民众运动来和政府捣乱；至于停止内战，他根本不同意有内战。于是我们就和他辩论起来，逐点批驳了他的错误。就在同一天，妇女界的李德全等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也去请愿了。妇女界几经交涉，等了几个钟头才

和大会代表见了面，而学联代表却尝了闭门羹。当天下午，我们招待南京新闻界，章乃器在招待会上介绍了全国各地救国会对当前时局的态度和主张以及各地游行请愿的情形。我在招待会上讲了各地救国会的组织情况，要求新闻界给予支持。当场有许多记者发言，表示赞成，《新民报》记者还讲了新闻工作受压迫的情形。爱国救亡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全民运动了。

我们回到上海以后就展开了大规模的爱国救亡宣传运动。当时日本正侵犯绥远，绥远军民奋起抗日。为了支援绥远人民，救国会组织了三百多个宣传队，人数达两千余人，大家分头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并开展援绥募捐活动，接触群众达数万人之多。上海的爱国宣传募捐援绥运动又影响了南京、华北、华南、西北等地，成为一个席卷全国的运动。国民党中的于右任、冯玉祥等先生也毅然公开表态，积极支持爱国救亡运动，反动派更加孤立了。

十一 救亡运动进入了高潮

七月十五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了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对敌共御外侮，由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同志出面，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公开表示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成见，精诚合作。中共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同意公开信的政治立场，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与此同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亦作出了支持救国的表示，甚至西南方面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也表示赞同我们的救国主张。这就把整个爱国救亡运动引向了高潮。

就在这时，九一八事变的第五周年到来了。为了纪念这个惨痛的日子，上海全市人民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游行，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都参加了。当我们的队伍走到小东门时，迎面突然出现了国民党的武装军警，他们高呼“冲啊！冲啊！”向游行行列冲来，接着大打出手。我连忙站到路旁一个人力车上，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等口号，国民党军警就向我冲来，我旁边的一位女青年的头部被打出了血，我的全身都被打伤，并因肺尖被打伤而咯血。幸而这时有一群工人把我保护了，他们用臂膀扣着臂膀奔向军警和我之间，构成了一条临时的人墙，把我救出，送到法租界的边沿，救了我的生命。二十年后，当我在解放了的北京的一个医院里看病时，碰见一个

老工人，他对我说：史良同志，你还记得二十年前在上海的一次游行吗？在那臂膀扣着臂膀的人墙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连忙向他表示感谢，但这个解放后过着幸福生活的工人却说：不用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共同责任！

十月十九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士鲁迅先生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悼念。宋庆龄提出，鲁迅先生的葬礼应由“全救”主持，因为伟大的鲁迅先生不仅属于文艺界，而且属于全国人民，一切爱国救亡运动的参加者，都对鲁迅先生怀有尊敬的感情。宋大姐的提议提出以后，立即得到救国会同志的热烈赞同。十月下旬，在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中，鲁迅先生的葬礼隆重举行了。那一天，上海全市的学生、工人、店员、作家、教授等各界人士近万人为这位伟大的革命文豪送葬。我在参加葬礼的行列中，和大家一道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口号，感到无比兴奋。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运动确已进入了高潮。我们的队伍雄伟、壮大、庄严、壮烈，实际上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爱国示威。当时，救国会的会员已达数十万人，爱国救亡运动遍及全国各地，早已深入人心。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嫉恨交加，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十一月十二日，即在鲁迅葬礼以后约半个月左右，正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全救”在上海静安寺路举行了孙先生诞辰的纪念大会。沈钧儒等都到会并讲了话，对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热烈赞扬，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所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代表在这次纪念会上发言，揭发控诉了日商对工人的人身侮辱和生活虐待的情形，并报告了工人罢工抗

议，要求改善待遇的情况。工人代表说：目前全市二十六个工厂四万五千多工人正举行大罢工，来支援日商纱厂内的工人斗争，但罢工以后，生活有困难。为了坚持下去，他呼吁上海各界人士从物质上给罢工工人以支援。工人代表的话，得到全场响应，就在现场组织了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募捐四万余元。大会以后，又由后援会继续开展募捐活动。为了保证此款及时到达工人手里，并用于解决生活问题，由后援会向粮店购买大米，直接发米票给工人，到粮店去领米。工人们在生活中既不发愁，便坚定地罢工到底，直到斗争取得了胜利。当时，上海大流氓头子杜月笙也正在插手此事，以调解为名，从中渔利。救国会的介入，打击了他们的渔利活动。处于困境的反动派恼怒交加，杜月笙这个大流氓也从旁怂恿，终于引起七人狱案的发生。

十二 山雨欲来风满楼

山雨欲来风满楼。远在我们被捕以前的六月间，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就在全市大中中学校长茶话会上的讲话中露了杀机。吴铁城说，现在有少数野心家，组织了一个什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里面不过二三十人在那里包办，说得上什么全国联合呢？这个团体简直是一个反动的东西。又说：救国乃是军事行动，现在政府在那里苦心孤诣地准备，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事实上不能向大家公布的苦衷，我们应该诚心地相信政府，服从政府，使它能以全力对外，如果我们不相信政府，使得政府又要分心来“安内”，这是很不好的。吴铁城的这段话意思很清楚，他们已经开始制造舆论，就要以“安内”为名向爱国救亡运动开刀了。

在吴铁城的这次谈话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其中之一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竟于九月间发表一个通令，指名救国会是一个未经党政机关许可的由一群反动分子组成的非法团体。另一起事件是十月间，一个由蓝衣社分子组成，叫上海特区最高会议的组织，在上海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竟然作出如下三条决议：第一，要用暗杀方法对救国会首脑处以死刑；第二，收买救国会内的动摇分子；第三，绝对禁止救国会的言论、集会行动。这班家伙的以上这些作为，非但吓不倒我们，反而更加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激起爱国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到了十一月，外面的传说更多，种种迹象表明，敌人的屠刀已经磨响了。果然就在这一个月，发生了七人之狱的事件。

十三 深夜被捕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深夜，我正在上海辣斐得路的寓所里休息，突然一阵吵闹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赶紧去开门。几个彪形大汉一拥而入，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就叫我跟他们走。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他们说到那里就知道。就这样，我就在没有任何罪状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被捕了。后来才知道与我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先生、章乃器先生、邹韬奋先生、沙千里先生等人。我先被解到卢家湾的法国巡捕房，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被解到高三分院。可笑的是在我们被押送时一切东西都被拿走，连裤带也被取走，据说裤带也是自杀工具，取走的目的是在防止自杀。这真是荒谬之极，我是无罪被捕，又怎么会无罪自尽呢？

在法庭上，我坦率回答一切问题，我承认我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承认在国是问题上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但是这有什么过错呢？审讯以后，我们就在二十三日夜间“责付”律师保出了。当时，我正在负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组织工作，为了同志们安全，我被保出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设法保护组织。哪知就在保出以后的当天，法院再度前来拘捕，我巧妙地逃走了。这个把戏究竟是怎么回事，始终没弄明白，只知道放走我们的是高二分院，重新逮捕我们的，则是高三分院。在我逃走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画影涂形，要悬赏五万元通缉

我。在这个情况下，我仍是很乐观的，因为我知道全国人民都不会允许他们这样乱来。为了嘲弄国民党反动派，我甚至还在上海爱文义路路口，一张悬赏通缉我的招贴下面，拍过一张照片。这张相片，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一个朋友那里。

一个月以后，即十二月三十日，救国会组织工作料理完后，我就自动投案，到法庭上去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为了避免通缉、追捕的麻烦，在我从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的途中，没有坐火车，而是坐的小汽车。我还记得，这部小汽车是向我的当事人——一个商人借的。朋友们仍怕不保险，又特意为我化了装。所以一直到我出现在苏州高等法院之前，国民党始终没有抓到我。

在我投案以后，就被关进了女监。

十四 在苏州监狱中

在女牢中，我和六十几个女犯关押在一起，她们几乎全部是劳动人民。由于朝夕相处，彼此就熟悉起来，不但互相都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而且彼此了解各人的案情。由于她们的亲属常来探监的关系，甚至我还认识她们的一些亲属。通过了解，我惊异地发现，在她们中竟有好些人是由于谋杀亲夫而被关进来的。其中陈王氏一案最为典型。她是一个女工，原有一个情人，也是工人。但她的父母却凭媒妁之言把她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商人。结婚以后，由于两人毫无感情，十分痛苦。那个男人不但不爱她，而且还编派她的不是，施以虐待。陈王氏不堪于这痛苦生活，而亲手杀死了亲夫，去寻找原先的情人。但这不过是一场梦境罢了，等待她的却是牢狱生活。这是一个妇女的惨痛故事，她的经历反映着千千万万在封建婚姻制度下被牺牲的女性的苦难，这种悲剧只有在全国解放以后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就是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权。妇女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权利，政治上的地位是很难得到保障的。虽然如此，解放后妇女受到欺负的情形仍然不少。

在牢狱中，我一方面积极为自己的“爱国有罪”罪进行研究，以便与敌人开展法庭上的斗争，一方面还帮助那些女犯们分析研究案情，事后我曾对人说过，这是我生平最忙碌的时刻之一。

那时，沈钧儒、章乃器等都关在男监里，我们之间互通信息，主要是通过来探监的家属和子女，所以我虽然和他们隔绝，但在精神上，却是声气相通的。其中有一件事，就是通过探监的人来互通消息的，便是坚决抵制敌人的诱降活动。原来，在我们坐牢的过程中，国民党不仅对我们施以高压，而且还卑鄙地对我们施以诱降活动。他们通过杜月笙、钱新之两人作说客，劝我们同意一个条件，就是由法院判处我们七人有期徒刑五年，但并不认真执行，而是解送到反省院，从反省院前门进去，后门出来。这是对我们的极大侮辱，也是对一切爱国人士和全国人民的侮辱。我们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并表示宁愿饿死在牢里也决不投降。

在我们被关押的时期里，全国各地的救亡领袖和救国会员也正在受到同样的遭遇。南京救国会的曹孟君、孙晓邨在我们七人被捕之后不久，也在南京被捕。各地救国会同仁因受牵连而被捕的，人数更多。在上海一个日本人开的纱厂里，有数千个女工因为不堪日本厂主的虐待和侮辱而参加了抗日罢工，但罢工刚开始，厂方就密报了捕房，致有数十位女工被捕。由于一位女工认识一位妇女救国会的会员，这位会员也受到了株连，无故被捕，受尽折磨。前后同案牵连的，达二十余人之多。象这样的事例，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发生。

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却在积极支持我们的斗争。“爱国有罪”的嘲讽已成了举国一致的舆论。宋庆龄大姐特为此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严正指出，这次逮捕是完全非法的，并指出这次逮捕行动实际上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所致。声明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

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让日本军阀当心些吧！他们虽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被捕，但还有全中国的四万万人民在这里哩！宋大姐的声明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各地声援电报，雪片飞来。国际著名的哲学家杜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拍电报给南京国民政府，表示严重不安。这对于我们在狱中的斗争是很大的鼓舞。

十五 法庭上的斗争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起诉书，是四月三日发出的。它所列举的“犯罪事实”有十条之多，其最中心的问题是救国会所提的口号与共产党所提口号完全相同，因此救国会实与共产党通同一气。六月七日，我们向法院递交了答辩状，对于起诉书上所列的十条罪状逐条予以批驳。在答辩状的最后，我们写道：据上陈述，可知被告等从事救国工作，无非欲求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与政府历来之政策，及现在之措置，均无不合。所列犯罪证据十款，无一足以成立。望法院秉公审理，依法判决，宣告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答辩状送去以后第四天，就开始审理了。

第一次是六月十一日下午，由刑事第一法庭审理，除家属和新闻记者外，禁止旁听。我是七人中最后被传讯的，审判长问的问题非常可笑。他先问我：全救大会宣言和纲领是什么意思？我最简要地答复他说：团结抗日。他于是问：你赞成各党各派联合救国吗？我说：凡是中国人，除汉奸卖国贼外，都应该联合一起抗日的。审判长见我回答得如此明确、坚定，就挑衅地问道：联合各党各派是联合共产党吗？我从容地答：救国会的意思任何党派都要联合，不管它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只是抗日不抗日。审判长听我的这段答话，知道我这个人不好对付，于是进一步挑衅了。他问道：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不是另组政府？我答道：政府与政权是有区别

的。政府是国家的机构，政权是这个机构发挥的力量。比如说五权宪法的五权也就是政权，并不能说要五个政府。我们主张扩大政权，并不是要另组政府。他又问：你反对宪法吗？我说：我没有反对宪法，而是在国难深重的时刻，喊出大众的呼声，要求抗日救亡。对审判长提的挑衅性问题，丝毫不退让。审判长脸红脖子粗，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主张联合各党各派，这不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吗？转来转去，他们还是转回到老问题上了。我随即严正驳斥他说：救国会主张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一致抗日救国，是由于全国国民的要求，不是跟着共产党喊的口号。最后，审判长问道：你知道救国会违法的吗？我说：不知道！我认为起诉书对援引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一个国民真的不符《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在今日，也只有劝导才是道理。我们并没有犯罪，把我们所有的抗日行动和救国主张硬拉到危害民国上去，我真不知道你们的用意何在？审判长被我驳得理屈词穷，只好问道：救国会登记了没有？我说：本来要登记的，但因怕你们政府为难，所以没有登记。因为政府如果准许我们立案，日本人一定要和政府过不去。但事实上我们多次和政府接洽，包括到南京请愿，政府都是接待的，可见我们实际上已得到批准，救国会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组织。我和他们唇枪舌战，在正直的斗争中他们完全失败了。

六月二十五日，第二次审理又开始了。这次审理还象上次一样，先在法院门前挂了一个牌子，说除家属和新闻记者以外一律不许旁听。二次审理时，审判人员作了调动，但所问的问题还是那一套。最可笑的是，审判长竟然问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知道吗？李公朴代表大家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四万万人都要抗

日，我相信审判长也是要抗日的，难道也被共产党利用了吗？这位审判长又和上次那位一样，被我们反驳得狼狈不堪。这样的审理一共进行了五次，他们始终一无所得。

我们案件的审理情况，当时的报纸都登载了。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上海市民举行了援助沈案市民大会，发表了宣言，严正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救国会领袖。国民党反动派的恶劣行径，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自己的处境更尴尬罢了。

十六 入狱运动

为了声援我们，敬爱的宋庆龄大姐和各界著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他们要求和我们七人一起坐牢，因为我们是因爱国而“犯罪”的，既然爱国有罪，那么所有爱国者都应入狱才是。他们写了一个十分生动的宣言。宣言说：“我们准备好去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为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所以我们要求我们所拥护而信任的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不然，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我们都为救国而入狱吧！中国人都有为救国而入狱的勇气，再也不用害怕敌人，再也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七月五日，宋庆龄大姐和胡愈之、张定夫、彭文应、王馥炎、张天翼、潘大逵、张宗麟、沈兹九、陈波儿等十余人来到苏州，要求入狱。这是一场斗争，紧张万分的敌人先派一庭长出面。经宋大姐训斥以后，院长才被迫出来相见。宋庆龄大姐严正指出，七人之罪，罪在爱国，若果如此，则我们也应入狱，因为我们也是爱国的。法院院长无词以对。接着，首席检察官也被迫出来和宋大姐见面，宋大姐又义正词严地对他进行了训斥。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爱国救亡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是无罪的。这时宋大姐就提出要探视我们七人的牢狱生活，

院长被迫答应。宋大姐等先到女监来看我，当时我被关在一个单人房间内，忽然看守来我牢房整理布置，还在小桌上铺了白布，放上花瓶，在花瓶里插了花。我正摸不着头脑，宋大姐已经踏进房门了。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见。在这次会见中，宋大姐鼓励我坚持斗争，对我说：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在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和她热烈拥抱，泪珠夺眶而出。我衷心感谢宋大姐和同志们对我们的支持鼓励，我也向大家保证，要同反动分子斗争到底。当晚，他们返回上海，受到各界人士的迎接。第二天，中外各报都登出了宋庆龄等自请入狱的报道。

入狱运动在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它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鼓舞了广大的爱国群众。

十七 形势急转直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当我们还在坐牢期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西安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了兵谏。我在狱中知道这件事，是在事变已经发生了多日以后了。事后知道，因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中，有释放救国会爱国领袖这一项，故陈果夫、陈立夫曾提出要杀害我们，以警告张、杨。虽然如此，在正式审判的时候，敌人还是提出了西安事变问题。但他们太拙劣了，他们竟然忘记，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在我们被捕二十天以后。气急败坏的敌人又以救国会曾给张学良将军打过电报为理由，企图把救国会案和西安事变联系起来，以加重我们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形势是不可逆转的。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意志，使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如意算盘都打不成了。

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不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在中共倡议下形成，紧接着，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投入了抗日斗争的烈火，我们也就恢复了自由。三十一日下午五时，我先由司前街女犯看守所释出，然后乘车到吴县横街看守分所，会见沈老等六人，七人同时出所。出门时，苏州群众一二百人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欢迎我们，他们还带来了爆竹，鞭炮齐鸣，欢呼声、歌唱声交织在一起，情景极为热烈。第二天我们回到上海，受到了更为盛大的欢迎。人民是支持抗日救亡运动

的，我们则和人民始终斗争在一起。我们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十八 我深深怀念他们

当我撰写此文，回忆起“七人之狱”这段经历时，是无限感慨的。因为在我们七个人中，除我以外，其余都已作古。使我特别怀念的是沈钧儒先生。沈老是一个永远坚定而又乐观的人。他是我们在狱内的家长。家长这个词现在有贬义，意为专断而缺乏民主，所谓“家长作风”就是这个意思。但在当时，当我们尊敬地把沈老叫作家长时，却是另一个意思，其内容是把我们团结成象一个家庭一样，沈老是我们这个战斗集体的领导人，所以称作“家长”。

邹韬奋是一个勤奋的人，他在七人中离开我们最早，是艰苦的战斗生活和辛勤的脑力劳动，过早地夺去了他的年轻的生命。韬奋的全部生活都和他的事业结合在一起，而他的事业又和整个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创办的《生活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得到广大读者的爱戴决不是偶然的。他热爱自己的事业，为了抢救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的生活书店，他东奔西走，焦头烂额，但反动派终于对生活书店下了毒手。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他的生命焕发出最大的能量。反动派的压迫使他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真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其入党要求在他身后得到了追认。

李公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最善于联系群众，也联系群众最多。许多爱国青年都和他往还亲密。大后方的许多群众性集

会与活动，他不仅参加了，而且有些就是由他负责组织的。他热情、坚定、勇敢，对革命事业一贯忠诚。在重庆校场口事件中，他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战斗，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终于被暗杀于昆明。公朴是为争取民主而光荣牺牲的，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

沙千里和沈老一样，解放前以律师为业，和我算同行。解放以后，他曾作过粮食部长和五届政协副主席，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能写文章，并富于文采。他曾写过《七人之狱》，这本书于一九三七年出版。其中生动地记述了我们七人从被捕到狱中斗争，到被释放的经过。这本书解放以后再版过。他还曾写过一本《漫话救国会》，一九八三年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全面叙述救国会活动的书，我曾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章乃器、王造时两位，也是当时的救国会的领导人，他们无论在爱国救亡运动中，还是在抗日民主斗争中，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两位在解放以后的一场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了，后来得到了改正。我和乃器是很熟悉的。他很能写文章，救国会早期有不少文件就是由他起草的。他还经营过工商业，团结了一些民族工商业者。解放以后曾任粮食部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我深切地怀念他。

十九 参政员生活

我在恢复自由以后，就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一道，到港澳等地宣传抗战。不久，国民参政会成立，我们都担任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为了担任国民参政员，我暂停了自己的律师业务。

那时，国民党公开实行一党“训政”，人民的基本权利毫无保障，广大人民要求民主的声浪很高，而国民党却玩弄各种花招，以拖延宪政的实施。国民参政会就是他们的花招之一。这个机构名为“民意机关”，实际上只是一种摆设。国民党自己似乎也并不隐讳这一点，它所公开的国民参政会条例中就明白指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请客吃饭，我们只不过是这个饭桌上的客人罢了。那是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九月，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四次大会，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提出了实施宪政的要求，提案有七个之多。救国会除了从原则上支持其他党派的提案精神以外，自身也提了两个提案。第一个提案的题目是集中人材。在办法中明确提出了几条：用人但问其才不才，不问其党不党；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存在；实施民主，使人人得贡献其意见，发挥其才能。第二个提案的案题是增强团结。办法有三项：不得磨擦；政府用人行政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实施民主法和政党政治。救国会的提案以

及其他有关宪政的提案虽然曾在会议中有过讨论，但是毕竟只不过是一纸空谈。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关于保障人民权利问题，救国会历次参政会中都要为此呼吁。但呼吁归呼吁，人民权利始终得不到任何的保障。

国民参政会虽然是这么个请客吃饭的地方，但我们还是利用它作了一些有利抗战，有利团结的工作。有两件事在我是印象深刻的。一件是在宪政期成会中关于妇女权利问题的斗争，一件是关于四川一个县长违法乱纪的案件。

宪政期成会是国民参政会内的一个工作机构，由委员二十五人组成。这个机构包括各方面的人士，政治主张不一，在讨论问题时，经常发生尖锐的斗争。有一次，为了宪法草案中关于妇女地位问题，争论得很激烈，我坚持要在国民大会中保证妇女名额不得低于百分之十五，这样才能保证妇女参政，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剥夺妇女参政权利，却虚伪地提出了“平等地参加选举”的主张，这个争论后来竟至发展到动武的程度，斗争虽然妇女获胜，但整个宪政运动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根本破坏了。

关于一个县长违法乱纪案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四川有一个县长，他在当地是一个小皇帝，经常欺压人民，无恶不作，有一次为了报复一个地方人士，竟把这位地方人士全家逮捕，非刑吊打，情节极为恶劣，引起当地人民的公愤。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就以国民参政员名义写信到当地专员公署，要求予以制裁。这个事件，终于以这位小皇帝的被撤职而告终。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在蒋介石这个大皇帝的罪恶统治下，欺压人民的小皇帝还不知有多少。这个事件，只不过是国民党罪恶统治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罢了。

抗战开始以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进步力量愈加仇视，斗争激化起来，我和国民参政会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反动派以精神动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四个秘密口号：“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阴谋打击一切进步力量。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反动军队终于发动了对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武装进攻。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一面强令皖南人民武装新四军北渡长江，一面密调反动军队中途袭击，造成了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事变既发，举国震惊，国民党破坏团结、坚持独裁、反对人民的面目进一步暴露于天下。中共参政员被迫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末次会议。我和救国会的其他许多同志，也宣布拒绝出席，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表示坚决抗议。在我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以后，继续和救国会同志们一道，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召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我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等同时被取消参政员资格，就是说，连请客吃饭也不同我们应酬了。我的参政员生活就此终止。

二十 和宋美龄在一起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名叫妇女团体指导委员会。这个组织顾名思义是指导全国所有妇女团体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妇女界的统一战线性的组织。它的指导长是宋美龄，委员却包括各方面人士，邓颖超大姐、宋庆龄大姐、沈兹九、刘清扬、吴贻芳等大姐都是它的委员。我也被聘为它的委员，并兼任妇指会联络委员会主任。这虽然是由宋美龄掌握领导大权的妇女组织，但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也确曾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在支援前线、宣传抗战等方面做过一些有利抗战、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记得有一次，有四百多个流亡女学生，被蒋介石的亲信陈诚收罗组织为一个战时服务团。为了争取这批学生，我们利用国民党反动派的内部矛盾，把这个战时服务团弄到妇女指导委员会领导下面来。后来，这批学生曾经在宣传抗战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其中一部分学生思想有了进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妇女指导委员会里，斗争是尖锐的，主要表现在宣传工作和联系群众工作方面。每年三八节，都要为宣传口号问题发生严重争论，国民党的唐国桢、陈逸云等人，连全国妇女动员起来参加抗战的口号都要反对，因为动员起来，就要唤起广大妇女群众，而他們是最害怕群众的。在组织乡村服务队问题上也发生过争论，但每次争论我们都胜利了。国民党里的人虽然和我们争得

很厉害，但宋美龄本人却从不表示态度。只有一次，为了一个训练班的教育方针问题，有一点红脸。那是一个以各省主席的夫人为主体的训练班。在会上，宋美龄说：你们都将有机会参加接待外国朋友的工作，一定要学会有关的礼节，例如吃西餐，怎样用好刀叉，就要学习。她讲完以后，宋庆龄就提出异议说：今天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不是会不会用刀叉吃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饭吃的问题。宋美龄很窘，于是一向与宋美龄站在一起的宋霭龄就出来打圆场说：“今天妇女界的问题，我看还是团结问题。”国民党表面上也在讲团结，但实际上，他们却正是破坏团结的罪魁。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人民基本权利从来得不到任何保证。许多人被无辜逮捕、杀害，许多青年由于阅读进步书籍、参加抗日活动而被关进集中营。文化、出版事业更是备受摧残。救国会领导人之一邹韬奋亲身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是“生活书店”的创办人和负责人，在全国各地设有五十多个书店，有三百多人参加工作。但到一九四〇年，大部分已被国民党勒封，并且有不少地方的书店负责人遭受逮捕。为此，韬奋非常着急。一天，他到我这里来，对我说，生活书店在陆续被封闭，情势紧急，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走一走门路？他说完以后，我立刻想起了宋美龄。因为我和她同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内工作，比较熟悉，而她又是一个当权人物。加之她这个人最会“做人”，喜欢笼络人心，所以我就想到，能不能通过她向蒋介石说情。韬奋同意我去试一试。我给宋打了个电话，约好时间以后就到她的住处去，蒋不在家，到中午时才回来。宋留我和蒋共进午餐，在午餐席上，宋美龄提起我的来意，我也着重地说，生活书店是抗战的书

店，出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书，为什么反被封闭呢？这太不公平了。蒋介石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有这样的事么？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一面这样说，一面表示一定要去查。看那情景好象很有希望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是完全相反，在这次谈话以后，各地书店继续被封门，韬奋气得忍无可忍，终于离渝出走 到 香港 去了。

在这个时期里，国民党反动派曾通过宋美龄对我进行过拉拢和诱惑。记得有一次，宋美龄请我吃饭，蒋介石也在座，她对我说：国民党需要增强新的血液，你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一道把它进行一番改革呢？对于这种伎俩，我是很清楚的，立刻就加以拒绝了。如果抛开政治见解，我对宋美龄个人印象是好的，她能干、大方，说话、做事得体。我深深地怀念她。我希望她能对祖国统一做出贡献。

我退出妇女指导委员会也是在一九四二年，当时我已在重庆恢复了律师业务。在我恢复律师业务以后，第一件案子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庆市公安局强占民房的事件，我代表当事人大中华药房，在重庆的大公报上以半版篇幅对反动政府公安局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公开谴责，这激怒了反动派。蒋介石亲自向妇女指导委员会进行了申斥，在此情况下，我被迫退出了妇女指导委员会。但我仍然继续坚持向压迫人民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后来，大中华药房案件终于在舆论支持下取得了公平解决，但我和宋美龄的关系就从此中断了。

二十一 参加民盟

一九四一年以后，我的政治生活的特点是，通过救国会和民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要把这一点说清楚，需要先把民盟的特点和它与救国会的关系说清楚。这要从头谈起，也就是说，要从民主政团同盟谈起。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一九四一年。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有六个单位，就是救国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和国社党、青年党。人们把它称作三党三派。民主政团同盟是在皖南事变以后成立的，这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有着直接联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明确揭示了贯彻抗日，争取国家独立自由：结束国民党“党治”，实施宪政，实践民主；尊重学术自由，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国民党党务活动；反对一切政治性特务机关等正确的政治主张。这个纲领同年十月在香港公布了。民主政团成立以后，以主要力量从事民主宪政运动，并继续坚持在国民参政会内外的斗争。政团同盟的活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使得民主宪政运动变为群众性的运动。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一九四一年，救国会参加民主政团同盟却是在一九四二年，这是什么缘故呢？这里有一段原委。原来在政团同盟中，组成单位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其中最突出的是青年党。青年党虽然和当局有矛盾，但从基本政治态度上看，它和国民党是一致的。青年党的领导人曾琦是

一个出名的反共分子。他们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救国会，唯恐救国会参加民盟以后，得罪国民党。但民盟中的多数人却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欢迎救国会参加，青年党阻挠救国会的阴谋未能得逞。

二十二 民盟的改组和初期工作

一九四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遭遇到困难，为了打通在中国的交通线来使它的部队获得补给，日本发动了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日本的进攻面前，毫无抵抗能力，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此情况下，政团同盟于五月上旬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结束一党训政，保障人民基本自由，以便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当时，民主政团同盟已经在群众中发生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却使这一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了。许多知识分子和有影响的社会人士已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政团同盟，这使政团同盟这个名称也名实不符了。政团同盟第一任主席是黄炎培，他是代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参加政团同盟的。黄炎培辞职后，继任人却是一位没有党派关系的张澜。这更是使政团同盟名实不符。就在这时，国民参政会举行会议。共产党在取得民主政团同盟和各方民主力量的赞同之后提出立即召开国是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立即获得各界人士的一致赞同。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主张，它的特点是把当时的一切政治口号统一了起来，集中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这是当时中国军事与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共产党的这一主张进一步鼓舞和推动了国民党区域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加强了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促进了党与同盟的

政治合作关系。民主同盟就在这个形势下于一九四四年九月由政团同盟改组建成了。在这年九月十九日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选举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当时，民盟在重庆的办公地点有两处。一处是在上清寺的特园，园主人鲜特生是民盟主席张澜的老友，鲜特生本人也是民盟的中央委员。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常来这里同在重庆的各界人士见面，郭沫若、茅盾等更是经常出现的座上客，因此人们把这里叫作“民主之家”。这个园子可惜在解放后的一场火灾中被毁，有关方面曾建议把它修复，作为对周恩来副主席和大后方民主运动的纪念。另一处是在中一路，当时的门牌号码已经忘记了，但还大致记得，门口是一个瓷器店，进了瓷器店以后，就可见到一片别有洞天的场地，在一间屋子的门前挂了“中华妇女节制会”的招牌，其实那就是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的所在地。在重庆市委员会选举成立以后，这个办公机构就改为民盟重庆市委。

民盟重庆市委会的改选是一件大事。这次改选对于日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选以前，民盟重庆市委一直被青年党把持。他们不仅操纵了当时的重庆市级组织，而且因此而影响到民盟中央。在青年党控制下，盟内的机关刊物《民宪》被办得不死不活，毫无生气，盟员很不满意。这次改选采取无记名方式进行，自下而上地酝酿候选人。选举结果，打破了青年党的控制局面，很多进步的同志当选了市委委员，其中包括陶行知、邓初民、刘清扬等。我也是在这次会上当选市委委员的。市委成立以后，推定我负责组织部，陶行知和邓初民分别负责宣传部和民主教育委员会。而在实际工作上，后来却调了一个个儿：邓初民负责主编盟市委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搞宣传

工作；陶行知以民盟的名义创办了社会大学，搞教育工作。《民主》星期刊在当时的重庆影响很大，和后来创办的《民主报》相配合，宣传了民盟政治主张。社会大学集中了当时一批进步教师，培养了不少人材。我认为，社会大学这个办学方向很值得提倡。我因参加了这所大学的校董会，和学校有些接触，知道他们的教师虽然阵容很强，但专职的却很少，校舍是借来的，经费基本上是靠学生缴纳的一点学杂费。由于他们真正做到了勤俭办学，开支十分节省，用钱很少，虽是民办却没有为经费所苦。在招收学生方面，也不拘泥于学历、资格，而以真才实学为主。在教学上，提倡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组织能力的教育）和技术教育并举。全部上夜课，这在当时的重庆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从它日后所培育的人才看，这所学校是办得相当成功的。但反动派却对它恨之入骨，说它是“异端”，必除之而后快。后来他们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底对它下了毒手。何其芳同志为文学系上了最后一课，感人至深。今天回忆起来，还是令人感叹不已。

民主同盟成立以后，进一步发展了组织，吸收了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参加，民盟的面貌为之一新。同年十月，它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这个文件在民盟历史上是一项重要文件，特点是把自己的政治观点从一般地要求民主提高到具体的政治主张。它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召集党派会议，筹备正式国民大会之召开及制定宪法；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的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碍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与条件；开放党禁，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地位，并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除特务及劳动营一类纯粹法西斯组织；

保障人民之最低生活，改善士兵及公务人员之待遇，对战时战后之受灾人民，尤应统筹统一救济；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之自由等。民主同盟的这一宣言，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其中一些要点，击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发表以后，立即获得各界人士和社会上的热烈赞同。

二十三 一九四五年的形势

一九四五年一月，周恩来副主席由延安来重庆，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民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响应。四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提出立即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坚持要召开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是联合政府还是国民大会？就成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焦点。民盟从这时开始，已经在政治斗争的基本观点上和中共完全一致。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恶毒攻击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必欲除之而后快。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战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所设想的中国，是进一步投效美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而中国人民却是要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矛盾是很明显的。在此形势下，民盟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其要点是：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协商国是；建立包括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在内的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团结、统一；废除国民党操纵的伪国

大，普选产生国民大会。这次会议不仅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从组织上扭转了青年党把持操纵民盟中央的局面。现在回想起来，这次代表大会确实十分重要，如果不举行那次代表大会，或那次代表大会若不能从政治上清除青年党的政治影响，就不能保证日后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民主同盟的政治立场。在那个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年份里，在整个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民主同盟的态度，确实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二十四 旧政协

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之后，最重大的政治活动之一就是参加旧政协。

旧政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国共两党双十会谈的产物。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副主席陪同下飞抵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毛主席来重庆使各方人士既意外，又高兴。大约是在九月份的某一天，邓颖超大姐领我一道到求精中学去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这是我初次和毛主席见面，我热情地和他们握手，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并讲了一些重庆的情况。毛主席、周副主席非常注意地听我讲述，并且不时插话，对我们在重庆的朋友们给予了极大的鼓励。我说：蒋介石这个人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在谈判中上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亲切地以同志口吻对我说，对于这个问题，是早有思想准备的，请朋友们放心。毛主席在重庆和蒋介石谈了一个多月，达成了“双十协议”，决定举行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这就是旧政协的由来。使我难忘的是，在国共双方会谈过程中，中共方面总是不断听取我们这些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以及各方面朋友的意见。尤其是周恩来副主席，他一面协助毛主席与国民党谈判，一面和各方人士保持接触，显示了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受到人们的崇敬。

旧政协会议是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举行的，国民党为了分化民

盟，在发表名单时，玩弄了一个花招，就是不把民盟作为一个包括三党三派的政治单位，而把它作为一个与三党三派相并立的单位，企图以此来削弱民盟作为国共两党以外最有影响的政治团体的地位。为了挫败国民党的这一阴谋，救国会和盟内其他党派的同志一道，坚决不以各自的团体出面。这样，就出现了国共两党以外一个统一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并推举统一的发言人对外发言。统一的民盟代表团共有九名代表。他们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勱、张东荪、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另设顾问若干人，马寅初、章乃器、邓初民和我都是顾问。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梁漱溟在旧政协失败以后自动退出了民盟。这是令人遗憾的。在旧政协会上，只有青年党背叛了民盟，单独成立代表团出席了会议。青年党在会上的表现充分说明，它已堕落成为国民党的帮凶。

这时，救国会在重庆的成员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为，它原先的政治纲领已不能适应抗战胜利以后的新形势。因此制订了新的政治纲领，并根据它在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发展改组了机构，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被选为主席，我被选为秘书长，陶行知和邓初民分别担任了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救国会虽然改组了机构，但它的一切活动都和民盟结合在一起。当时救国会纲领所提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并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根本原则是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联合政府，发展民族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民主主义的文化。所有这些政治主张，都是和民盟的政治主张大体一致的。而为了取得在政协会议中的斗争胜利，救国会

更没有独立参加的必要。

一九四六年一月，旧政协开幕了。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民盟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密切合作。大家把矛头共同指向国民党内一小撮反对团结、反对民主的反动派。在会议开幕的第一天，蒋介石代表国民党发言，提出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四项诺言。蒋介石这个发言，在当时曾迷惑了一些人。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完全是他的谎言。四项诺言日后一项也没有兑现。中共和民盟代表在会上提出了民主、和平的政治主张，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民盟在会议上反复强调的政治立场是，以党派协商的方式解决国是问题，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强烈要求政治民主，人民自由。民盟的这些政治观点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盟员的政治利益，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原在盟内的青年党这时从盟内分化了出去，成立单独的代表团参加会议，青年党在这次会议中的作为，证明它已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在会议中，民盟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必须事先经过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中共、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其后，民盟又与中共共同向国民党提出，要求在拟议的国府委员会中，中共、民盟同保有四分之一的否决权。这是中共、民盟在政治上互相信任的一项十分重大的行动。

二十五 国民党破坏旧政协

旧政协通过的五项决议公布以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它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却使人们的希望被泼上一盆冷水。国民党反动派对旧政协横加阻挠，进行了种种破坏。早在政协会议期间，民盟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就曾突遭国民党特务的搜查。政协会议闭幕以后，重庆各界人士于二月十日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有预谋地捣乱会场，殴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六十余人，其中民盟中委李公朴伤势最重，这就是著名的校场口血案。那天，我也参加了大会，曾亲见到特务分子大打出手。他们卑鄙极了，竟用一种钉有钉子的木棍打人。事发以后，周恩来同志闻讯赶来，当面怒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行径，在现场作了紧急安排。然后他把我拉上他的汽车，对我说，已把公朴送到医院了，我们现在赶紧去医院。恩来同志还对我说，你是律师，可以代表受伤的人向法院起诉嘛！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时我才知道，参加大会的一部分工人已经抓到两个行凶的打手。这两个打手交代说，他们都是临时受雇来的，共有五百多人，每人可以领到一元六角钱，外带一碗面条。他们两人还说出了指使人的姓名。我听了十分气愤，当天就去法院找到姓方的院长，声明代表受伤人员起诉。那个姓方的对于这件事，连听都不敢听，但也不得不予受理。第二天开庭，我代表被打伤的李公朴等控诉特务、暴徒打人行凶的罪行。法庭的旁

听席上挤满了听众，审判官在通过例行的验伤、传讯等手续以后，就把那三个指使行凶的人判了几年徒刑。这是国民党的另一种手法，他们在政治上达到了捣乱的目的，而在法律上不过只处分了那几个微不足道的小流氓。我感到我们上当了。事后我把这事报告了周恩来副主席，并谈了我的看法。但周恩来同志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说，我们从来不对他们的法庭有什么幻想，我们起诉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惩办那几个暴徒。我们的目的是要从政治上揭露他们，利用敌人的法庭，达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目的，让人们看清他们的面目。斗争还多得很，斗争的道路还长得很。这件事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政治斗争和法庭斗争之间的关系，对敌斗争和教育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的战斗和通向胜利的斗争道路之间的关系。

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二月，国民党指使特务学生欺骗一部分落后群众在重庆制造了反苏反共游行，捣毁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三月，国民党特务在西安捣毁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举办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报，杀害了该报法律顾问、盟员王任律师。五月，国民党政府还京以后，民盟、民主促进会等十二个团体来京请愿时，在南京下关车站受到国民党特务毒打，马叙伦等代表受伤。种种暴行，层出不穷。人们已经预感到，形势将要急转直下了。

二十六 李 闻 血 案

历史的洪流在这里出现巨大的波澜。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撕下民主、宪政的伪装，公然在昆明无耻暗杀了民主领袖李公朴、闻一多，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更大愤怒。我们在重庆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群众性追悼会。当时，民主人士中的大部分人都已复员到南京、上海，民盟总部也已迁到南京，民盟负责人中只有邓初民、鲜特生和我留渝。筹备当中，张群因他事来渝，我们决定利用他一下，由邓初民、鲜特生和我共三人去找张群，请他领衔筹备会的工作。果然收效，一些人本来不便参加民盟的活动，现在由于张群的参加，就减少了许多麻烦。记得那天参加大会的还有吴玉章、许德珩、张友渔、张笃伦、孙元良、胡子昂、周炳琳、何其芳、沈起予等，会场内外都挤满了人，各界送来的函电、挽联、花圈等达一千二百余件。我们在讲台上横写着“民主之魂”四个大字，讲台正面悬着李、闻的遗像。我们在会上都讲了话。当我讲到“烈士们为什么而死？他们是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死；烈士们是被谁打死的？他们是被那些不要民主、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人打死的”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那天，吴玉章、胡子昂、邓初民等的发言都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后来，当我回到上海以后，我又参加了上海各界追悼李、闻的大会，情景几乎完全相同。这说明，人心向背，是十分清楚的。通过这两次追悼

会，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人民和我们站在一起，我在那时已经坚信，有了人民的支持，正义一定战胜邪恶，反动派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二十七 在国民党悍然召开伪国大以后

一九四六年十月，利令智昏的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将于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十一月十一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拒绝参加，十四日发出《紧急通告》，要求民盟各级组织贯彻民盟中央这一决定。十五日，非法的国民大会在国民党一手包办下开幕，青年党、民社党参加了伪国大。民盟于二十四日举行中常会，决议开除参加伪国大的盟内动摇分子。

一九四七年一月，民盟在沪举行二中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全盘估计了形势，明确指出政协决议被破坏的责任在于美、蒋两方，并指出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实际上是国民党最后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纪念日期”。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强令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谈判代表限期撤回。三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公开声明“政治解决已经绝望”。实际上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早已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就已遵循其二中全会否认政协决议的方针，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人民的内战。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拥有反动军队四百三十万人，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和所有大城市。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一百二十万人，在装备上也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加之国民党反动派有美国作靠山，因而他们满以为可以通过武力摧毁人民革命力量，明目张胆破坏政协决议，疯狂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民盟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从全国人

民要求和平的良好愿望出发，于局势严重恶化以后又再次发动了和平运动。五月十四日，民盟中常会决议，民盟参政员全体出席国民参政会，利用这一讲坛，联络同情和平之参政员和各民主团体再次发动和平运动，并由民盟中央成立专门机构，切实推进和平运动。参政会期间，张澜等五位参议员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要求重新举行和平会议。国民党参政员却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和民盟立场截然相反的促请新政府下令全国总动员，以“加速共产党救平”的提案。民盟发动的这次和平运动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民盟的立场和广大知识分子对当时时局看法，却通过会议内外的活动公之于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起了揭露和谴责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里，国民党反动派仍然继续向我进行威胁利诱，企图分化进步力量，维持反动统治。一九四七年三八节前几天。国民党法院突然以传票通知我，我很惊讶，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法院要出传票。正在此时，国民党通过其他关系通知我，只要今年不参加三八节的活动就没事了。我拒绝了他们的条件，也没理会法院的传票。这样他们就改变了花招，改行拉拢。有一次，由美帝国主义的驻沪总领事出面，约请部分民盟留沪负责人到领事馆吃饭，商谈时局问题，我拒绝了。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对我恨之入骨，曾把我列入黑名单，企图暗害。

二十八 民盟被迫解散

形势是严峻的。我和同志们都已充分认识到，我们前面的道路是艰险的，困难的局面很可能即将到来。果然，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民盟与中共曾公开否认宪法及国民大会之合法性，该盟与反叛政府之中共既有密切联系，虽仍称系一和平之政党，然政府对该盟之态度将视其政策及行动如何而定。”七月初，国民党政府悍然公布“勘乱令”，接着就在十月二十七日由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这在民盟历史上是一大挫折，也是一大曲折，但归根到底，却导致民盟的根本转折。正如新华社当时发表的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一文中所说：“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主同盟的光荣。”“民盟现在应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持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民盟被迫解散，引起民盟盟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在形势的推动和广大盟员的热切期盼下，民盟三中全会于一九四

八年一月在香港召开。沈钧儒和章伯钧主持这次会议。当时在香港的中央委员人数不多，为了取得这次会议的合法性，也是适应当时的特殊环境，允许中央委员委派代表参加会议。我也是委托别的同志代表我参加这次全会的。全会开幕后立即发表紧急声明，严厉申斥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宣布不能接受被迫解散的任何决定。号召全体盟员“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二十九 民盟历史的转折点 ——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以前，民盟一直是以第三者的姿态出现。所谓第三方面，就是指的国共两党以外的政治力量。但真正的第三者是没有的。例如在旧政协中，民盟就和中共站在一起，而青年党却是和国民党站在一起。不过民盟在政治上所处的地位毕竟是第三者的地位，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了的。三中全会开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它已没有必要再以第三者的姿态出现了。就在民盟举行三中全会的前十天，中共中央举行了重要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著名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民盟三中全会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以后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事业而作的英勇斗争，宣布今后要与中共携手合作，为推翻蒋介石反动集团在中国的统治而奋斗。这样，民盟就成为一个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它不能不引起民盟的性质的变化。三中全会还决定在港建立总部，在解放区设立盟务特派员，整顿组织，清洗动摇投机分子。三中全会闭幕以后，民盟各地组织纷纷致函香港总部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民盟三中全会表示热烈欢迎，“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

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三中全会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民盟三中全会以后，受总部委托，在上海建立了华东执行部，我参加了华东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盟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从此，我除了公开执行律师业务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放在民盟的地下工作方面。由于环境险恶，执行部的会议有时只能在汽车里举行。在万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保存了盟的组织，并在联系群众，宣传民主，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方面，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三十 解放前夕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全上海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当时的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曾发出密令，要“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我被迫躲避到一个亲戚家里。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发现墙壁上贴满了反动派的标语，写道：“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里（里弄）杀绝。”美蒋特务真是恶毒已极！为了不给别人增加麻烦，住了几天以后，又换住到另一亲戚家里。我住在这家的二层楼上，对面正是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区长的住宅。有一天，这位区长的鸽子飞到我这边来了，他到我住房来找鸽子，我的行踪险些就被发现，赶紧搬家。在路上，为了避免查身份证的麻烦，加速了汽车的速度，在红绿灯的转换中冲来冲去，辗转好几个住处，才逃出了反动的魔掌。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搜捕，就变得更加疯狂了。五月十日那天深夜二时许，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突然出动吉普、卡车三辆，以二十余名武装和便衣特务将我在上海的寓所团团围住，然后蜂拥入宅，大肆搜捕。当时我已躲到亲戚家中，特务就抓住我家一位老工友宋阿福，酷打逼供，随后又拽遍全宅，把全家大小人口，不管是厨师还是女佣，一律进行个别审问。毫无结果，只好留下几个武装人员把守住宅，以“守株待兔”。第二天，特务又来，将宅中人员再问一遍。到第三天，则对宅中人员轮流用刑，惨号之声，闻于街邻。十三日夜，司机阿宝入室被捕，经通夜酷刑，他说出我爱人陆殿栋之弟陆殿奎的地址。陆殿

奎是商人，不问政治，但亦因而被捕。但由于绝少往来，虽经严讯而毫无所得。特务对他说，我们对你大嫂已监视三年了，现奉命来捕，却又不见，你若不招，我亦难以交代，只好对不起了。从此陆殿奎即入牢房。司机阿宝在严讯酷打之下又说出我姑母家的地址，于是姑父母荣宝礼夫妇随即被捕，关押在福开森路二十号。其后连锁株连六七人，终于找到我的躲避地点，警备司令部武装特工人员星夜包围南市某宅。但我已在十分钟前得到消息转移他方。送信人尚未离去，身上搜出报信字条，当即被带走。

五月十五日，我的律师事务所田秘书被捕，她被移送到特务的秘密看守所，把手反绑到背后，吊在墙上，以皮带乱抽。打了一个多钟头后，因见田秘书始终未哭，特务说：厉害厉害！不愧为史良秘书，把她送去活埋。于是，田秘书被转移到南市某地执行处拘留室。她到那里以后才发现我们的亲戚朋友一大堆都关在那里，等候执行。拘留一天后得知黄炎培先生长子黄竞武烈士已于前一日遇难，系在夜阑人静时执行，执行时先用绳索勒死，然后埋入土中。由于同时等候执行的人太多，来不及按上述办法办理，而解放军已临近上海。拘留所长接到上司命令，改为用卡车装运投入黄浦江里淹死。田秘书等七人被装入一个卡车中，途中卡车损坏，停车修理之际，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打进城，枪声不绝，执行人员逃命四散，田秘书等始得幸免于难。我和我的爱人自离开那家亲戚以后又转移他处，一些人家已不敢收留，同时我亦不敢信赖关系不深的人家，只能到极为可靠的同志处，而这些同志本身亦在被监视中。正在踌躇之际，二十四日晚忽睹国民党军纷纷溃退，夜半十一时许解放军装甲车十一辆已冲入霞飞路的交通大学附近，时我正在挣扎于途，天已快亮了。

三十一 天亮了

上海解放以后，我和宋庆龄大姐见了面，又和陈毅同志见了面。我们于胜利时刻相见之时，热泪盈眶，我和宋大姐相抱而泣，共享这胜利的欢欣。在市长的招待会上，陈毅同志以儒将风度讲了上海战役和这一胜利的重大意义，以及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还讲了党的城市政策。我激动得难于控制自己，竟说不出话来。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盟和各民主党派立即通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响应。其后民盟又发表声明，积极拥护。九月，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等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与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一道进入东北解放区，共同筹备新政协。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民盟代表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他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郑重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三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回北京，成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全盟工作。一九四九年底，民盟总部正式建立。在这段时期里，民盟的主要工作是和各民主党派一道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人们充分认识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

来。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即将诞生，整个世界都将注目这一出现在东方大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到达北京后，就立即投入了新政协筹备工作中。当酝酿新政协委员名单时，周恩来副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只提了一条：从总名单看，妇女太少了。周副主席同意我的看法，说以后要逐步增加，新中国的妇女地位提高了，必然会人才辈出。九月二十一日，新政协开幕，我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和张澜、沈钧儒等一道参加了会议。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典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后来我回忆这次重大节日，写下了以下这段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帝国主义者讥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两个月后，人民救国会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北京饭店举行茶话会，招待在京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宣布救国会结束，发表了结束宣言。救国会之所以宣布结束，主要理由是它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那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莫斯科访问。后来，他在完成了和斯大林的历史性会晤以后回到北京时，曾说，救国会的结束是不应该的。中国革命事业还要继续下去，救国会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任务并没有终结。现在回忆起来，这是件憾事。

三十二 解放以后

解放以后，日子过得很快。朋友们见面谈天，都有同样的感觉，好象时间的概念也在改变似的。我的工作，起初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司法部，后来体制改变，司法部撤销，我改任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在人大任内，我经手处理了不少人民来信。我认为，处理人民来信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人民来信是直接来自群众的呼声。这些来信，有的是有所陈述与建议，有的是有所申诉和反映，都不是无的放矢。由我处理的人民来信中，绝大多数来自妇女。新中国建立了，妇女翻身了，但妇女们受到的委屈仍然不少。记得在讨论婚姻法时，我就从自己长期为妇女办案的亲身体会中提出，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中国妇女所受的苦难是很深重的，因而力主妇女有一方提请离婚的权利。后来，这个建议受到了尊重，妇女一方离婚权利受到了保护。我还知道一些农村妇女的情况，据我所知，虽然男女平等已经实现，但很多地方的妇女仍然没有得到“同工同酬”的权利，我曾为她们作过积极争取。实际上，我们中国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话，而是反映着实际情况。

我在民盟的工作有增无减。不管怎样忙，我对民盟的事是从不懈怠的。从一九五〇年民盟的四中全会开始，民盟正式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党的助手。解放后的民盟工作可以分

为几个阶段。从解放初期到三大高潮是一段，在这个时期里，民盟主要工作是参加政权建设，动员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群众参加社会改造和经济文化建设。他们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民盟成员的特点是文教界知识分子居多，所以民盟的工作以参加国家文教建设为重点。民盟成员还积极参加了教育改革、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对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主观世界。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根本的改造。只有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立场、观点、方法上认真改造自己，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步伐，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自己也是这样认识的。我在解放以前的长期生活中接触劳动人民很少，这使我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局限，通过学习和实践，认识有所提高，思想境界也为之开阔了，心情也就更加愉快。看到我们的广大盟员在改造与服务这两方面都作出了成绩，我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这个时期里，民盟的组织经过整顿，有了较大的发展。当全国解放时，全盟共有盟员五千八百五十七人；到一九五六年底，全盟盟员人数达到二万五千六百八十五人，文教界占多数。

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是我最关心的工作，也是民盟在这一时期的突出工作之一。我所参加的一个学习组，是由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我们坚持学习，从不间断，成为一个雷打不散的集

体。我们除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以外，还着重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建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认识。我记得有一次我见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向他们谈起我们学习的情形，周总理非常高兴，他鼓励我和民盟的同志们要经常学习，但他又非常强调学习要自愿，只有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学好，并把它应用在工作与社会实践。邓大姐也是很注意学习的，当我向她谈起我们的学习情况时，她说她也是这样学习的。民主党派在解放以后有了很大进步，现在回忆起来，确与抓紧学习有很大关系。

为了做好工作，我们除了学习，还经常出去调查研究，亲眼看看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进步。每次出访归来，大家都感到收获很大。

在这个时期里，民盟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都有所扩大。它参加了各民主党派的两次联合宣言，参加了国家代表团的出访和国际和平民主运动，我自己也到苏联、印度等国作过访问，为发展人民外交尽力。在这个时期里，许多在国外的和民盟有联系的爱国知识分子也陆续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民盟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指出：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前，统一战线面临着新的任务，就是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为此，当前盟的政治任务就是：团结全体成员和盟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反对国内外敌人而进行斗争。会议还明确提出：“一切

为了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总方针、总任务。这次大会的决议，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就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过渡。从这时开始，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随着阶级关系的上述变化和主要矛盾的发展与变化，民盟的性质已经有了发展和变化。民盟已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地接受党的领导，开始向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过渡。但是人们当时还没有认识或没有完全认识这一点。

三十三 从“反右”斗争到 “文化大革命”

一九五七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坚决反击这种进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在盟内，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一部分盟员和盟的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挫伤了知识分子和盟的各级组织的政治积极性，各级盟组织内一些有经验的领导成员在“反右”以后离开了领导岗位，影响了盟务的开展。由于盟的各级负责人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较多，严重地损害了民盟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影响。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的“章罗联盟”，在组织上是不存在的，各级组织的所谓“章罗联盟分店”更是没有根据的。怎么会扩大化了呢？我看是由于当时对广大知识分子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把知识分子中少数不满社会主义的人，估计过多了。在我们社会里有没有人不赞成社会主义呢？当然是有的。如果说没有，那倒反而奇怪了。但有一点应该肯定，绝大多数人是拥护共产党，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右扩大化留下了消极的后果，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从一九五七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民盟在推动成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出成果、出人

才”而贡献力量，做出了成绩。尤其是在开展形势教育、政策教育方面作出了较好的成绩。在党的领导下配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是这一时期的一项突出任务。开展“三个主义”教育的形式是通过毛主席所倡导的“神仙会”的方式，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实践证明，这在当时是一种较好的、适当的学习形式，现在仍然适用。在这一时期里党所倡导的向工农群众学习、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及“走马看花”、“下马看花”等联系群众、接触实际的形式，是有利于知识分子自我教育的适当形式。通过这些工作，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了新的进步。

在组织工作方面，在这一时期里，也有一定的发展。民盟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间的那次比较集中的发展，总的看来是健康的，没有发生过所谓“恶性大发展”的问题。截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全盟共有盟员二万六千多人，其中文教界盟员一万九千九百多人。他们大都是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中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在发展盟员的同时，进行了整顿巩固，各级委员会吸收了一些在文教科科技界有影响的盟员参加了领导工作，推动了盟的工作的开展。

在这个时期里，民盟举行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一九五八年冬季举行的。大会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号召全盟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和解放台湾的斗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加速进行盟的组织和盟员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三项任务。但由于受了当时社会上“左”的思潮的

影响，这次大会在分析民盟的性质以后，给组织戴上资产阶级性政党的帽子，给成员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不适当的。大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规划”，有严重的过急倾向。在这次大会举行以后，特别是一九六〇年以后，在民盟工作中存在着过多地强调阶级斗争，片面强调改造的偏向，根本原因在于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缺乏正确估计；相反，在一些作法（如在配合所谓“拔白旗”和学术思想批判的运动）中，在政治上和感情上伤害了一部分人。这些都是“左”的影响在民盟工作上的反映。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对民盟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我也在这次动乱中受到了冲击。事后才知道，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很少。在这场浩劫中，我们损失了许多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盟的领导人。庆幸的是，在“文革”中被迫害的广大盟员和知识分子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经受了考验。他们仍然怀着爱国热忱，为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进行艰苦的学术活动、教学工作和创作实践，不愧为受党教育多年的革命知识分子。

三十四 新的春天

在“文革”过程中，民盟各级组织的活动全部停止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民盟才开始恢复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我们的国家得到了新生，民盟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有几件事情是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件是中共党的“十二大”在京举行，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大会，我和其它民主党派负责人一道列席了这次大会，这对我是一项莫大的光荣。在这次大会上，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比八字方针更进了一步，它极大地鼓舞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祖国的新的春天已经到来了。第二件是我参加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制订一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继一九五三、一九七二、一九七八这三部宪法之后的第四部宪法。其中第三部宪法最糟，在那里面不仅反映了许多极“左”的东西，而且还反映了许多“四人帮”的观点。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巩固地统治了整个国民经济，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基本依靠力量的条件

下制订的。它反映了上述社会经济的伟大变化，集中了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共同的政治要求。它的生动性就表现在它记载着我们已经获得的一切——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人民民主专政。第三件是民盟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粉碎“四人帮”民盟恢复活动以后的第一次大会，大会确定了民盟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进步。民盟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民盟性质的变化，正是反映这个现实。我和我的同志们都为民盟在性质上的这一变化而深受鼓舞。今后，民盟的地位、作用也必须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在我国“四化”建设中的责任也就更加重了。

三十五 美的赞歌

我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我是一九〇〇年出生的，我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纪。我出生在常州，但却多年没有回到家乡去。最近，有两个与我的故乡有关的单位请我题词。一个是我的母校——常州实验小学，他们要整理和美化校园，希望我题几个字时，我题了。写的是“春色满园 桃李芬芳”，当我写下这八个字时，内心充满着喜悦。我不仅是为我的母校而写，也是为我的祖国而写。后来，《常州县志》要出版了，也要我题几个字，我也题了，也是八个字：“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还象上次的心情一样，我的内心充满着喜悦，我也不只是为故乡而题，并且是为祖国而题的。在我们这样一个物产丰富，人才辈出的国家里，未来是多么令人向往啊！“春色满园 桃李芬芳”、“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这是我对母校、故乡的美好赞歌，也是对我们伟大祖国、伟大人民的美的赞歌。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一九八五年)

附 录

三次难忘的会见

——纪念宋庆龄大姐诞辰九十周年

明天是宋庆龄大姐的九十诞辰。这本来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但我们敬爱的大姐已离我们而去了。怀念宋大姐的一生，不能不引起我的由衷的敬意和沉痛的追思。

宋大姐待人至诚，益友情深。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从和她的长期交往中，经常享受到她的友情，春风化雨，温暖宜人。她是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去世的，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年的圣诞节，她还约我去参加她的家庭晚宴。那天她高兴极了，由于兴奋，显得非常年轻。那天同去的，还有戴爱莲，爱莲为我们两人拍了一张合影，竟成为我们最后的纪念。我和她相识半个世纪，都亲见过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我特别钦佩她的远大的见识和坚定的信念。远在一九三五年，她就对外国朋友说过：你们会感到中国的情形很糟，但我劝你相信，中国的情形一定会好起来的。中国有个共产党，希望就在这里。半个世纪以来的实际，完全证实了宋大姐的预言。

宋大姐常常在我生活中的重要时刻，给我以鼓励。在我和她的长期交往中，有三次不平常的会见，是我永远也难以忘怀的。

第一次，是一九三七年在苏州监狱中。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

以“爱国有罪”而逮捕，构成“七人之狱”，我是七人之一。我们在法庭上和监狱中向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宋庆龄大姐则在狱外配合我们，开展了政治斗争。在一篇题为《为七领袖被捕事件的宣言》的文件中，宋大姐和何香凝、马相伯三人为我们发出了正义的呐喊。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反动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壓力，急欲以镇压爱国救亡运动来媚敌苟安。宋大姐等在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情的要害，郑重宣布：“救国阵线唯一的目的只是促成全国人民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政治主张如何，能够团结一致，完成抗日救国的任务。救国阵线决不反政府，恰恰相反，它是督促和支持政府抗日的。”“我们正同全国有良心的同胞一样，要求立刻无条件恢复被捕几位先生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而被捕的同胞，以巩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作，加强全民族抗敌的力量。”

这个宣言不仅对我们七人是一个极其巨大的鼓舞，而且国内外影响极大，声援函电似雪片飞来。其中包括知名人士李宗仁、冯玉祥、于右任等人。国际著名学者杜威、爱因斯坦等也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迅速释放我们。

国民党反动派在对我们七人所进行的所谓“审判”中，露出了杀机。其依据就是企图把爱国救亡运动和西安事变直接联系起来。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张、杨两将军和广大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和士兵是同情爱国运动的。我们亦不否认，我们内心十分支持张、杨二将军所发动的对蒋兵谏。但“西安事变”发生在七人被捕之后，硬把“七人之狱”和“西安事变”直接相联，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早已有小道消息传出，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确有一部分人曾企图用杀死我们七人的办法来恐

吓爱国将领，以达其扑灭抗日怒火的目的。但我们坚持了斗争，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终于战胜了敌人。

在此，我要特别提到宋庆龄大姐等所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宋庆龄、何香凝等十六人，为了援救我们，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扩大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向江苏高等法院递出了一份呈文。呈文在叙述了七人之狱的无辜之后指出：“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具状人等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为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责。”呈文发出后的第二天，宋大姐等就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阐明救国入狱运动的意义和目的。并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说：“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先生等。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大姐等发动的救国入狱运动发展起来以后，得到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并引起国外人士的广泛注意。七月五日，宋大姐等十二人来到苏州，要求入狱，这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江苏高等法院先由一位庭长出面敷衍，经宋大姐训斥后，院长才被迫出见。宋大姐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身份，义正辞严地向他进行了责问，法院院长无辞以对，狼狈不堪。这时宋大姐就提出要探视我们七人的牢房生活，院长被迫答应。宋大姐等先到女监来看我，当时我被关在一个单人房间内，忽然看守来我牢房整理布置，还在小桌上铺了白布，放上花瓶，在花瓶里插了花。我正摸不着头脑，宋大姐已经踏进房门了。这

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见，宋大姐鼓励我坚持斗争，对我说：“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在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和她热烈拥抱，泪珠夺眶而出。我衷心感谢宋大姐和同志们对我们的支持鼓励，我也向大家保证，要同反动分子斗争到底。这是我和宋大姐的一次难忘的会见。

另一次不平常的会见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底，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在这以前的两三个月，上海气候骤变，阴云密布，眼看就要大雨倾盆。面临灭亡的敌人疯狂倍增，对进步人士加紧镇压，形势险恶。我得到地下党的转告说，国民党特务已把我的名字列入了黑名单，随时可能捕人，让我迅速隐藏起来。起初我藏在我的姑母家里，后来考虑到我和姑母时有往来，她家地址容易暴露，就转移到另一亲戚家里。我转移以后不久，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出动三辆吉普车，载着二十余名武装人员和一些便衣特务，把我的原先住宅团团包围，进行了大搜查。当时我的秘书、司机和女佣均在原住宅，此时便被集中到一个房内，进行审讯。审讯不得结果，留下五个武装人员看守他们。到了晚上，便衣特务又来了，对每个人进行了个别审讯，我的司机被逼说出了我的姑母家的地址，特务随即将我姑母家看守，并进行搜查和审讯。这时我正在南市另一亲戚家中，当特务找到时，我恰好离开那里刚刚二十分钟。但我的秘书却被捕了，受到残酷毒打。由于审讯得不到结果，她被送到执行处的拘留所。在那里已有不少等待执行的人，其中我的亲友达七人之多。黄炎培的长子黄竞武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我出走以后，四处躲藏，直到上海解放。当我终于再次和宋大姐见面时，我们都被胜利的喜悦

悦而激动得不能自己。宋大姐说：国民党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背叛了人民，共产党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属于人民，和人民在一起。从此，我下定决心，要以全部智慧和力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永远在一起。

全国解放以后，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虽然我和宋大姐都比较忙，但仍继续保持联系，经常来往。“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就很难见面了。就在那困难情况下，我们却有过一次不平常的见面。

那是一九六七年的国庆节，民盟机关“造反派”的个别人不仅到我家扫了“四旧”，而且“勒令”我到机关参加劳动。我的车也被停止了，司机也造反了。但却收到了国庆节观礼的通知，只好坐一部三轮车赶到天安门附近，然后再走一段路程。由于年纪较大，走一段长路是比较吃力的，但总算上了天安门城楼。事后才知道，造反派曾经派车追赶，不许我上天安门。只是由于在追赶路上没有发现我，才被我“混”上天安门的。当我和宋大姐在天安门城楼上见面时，彼此默默无言，深情地握了手。大姐悄悄地对我说，你的情况我已知道了。我也说，你的情形我也知道了。那时，江青、张春桥之流不仅否认统一战线，否认民主党派，而且认为知识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他们否定历史，也否定历史人物，连孙中山先生也被他们视作牛鬼蛇神，归于打倒之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言的会见却更胜于千言万语。我们坚信，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乌云绝对遮不住太阳。在这次会面以后几天，宋大姐派人送来一罐亲自做的小菜，是纪念我们这次难得的会见的。这次会见我将永远难忘。

敬爱的宋大姐离开我们近两年了。这两年中，祖国面貌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党的十二大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人大、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制定了新的宪法和政协章程，全国人民为在本世纪末达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前途而欢欣鼓舞。在党的领导下，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更加扩大了。在这个时候，回忆起和宋大姐的三次不平常的会见，高山仰止，感想万千。宋大姐啊！您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也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一九八三年)

永远的怀念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但总理的声音笑貌，如在眼前。尤其是他为人民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和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业绩，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激励着人们奋勇向前。

我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战斗年代里和周总理初次认识的，直到总理逝世，有四十多年的交往。缅怀往事，历历在目，伤痛之余，唯有自励而已。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飞抵重庆，和国民党政府举行谈判。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一向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著称的蒋介石，这时却以抗战胜利者自居，要窃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全国人民一方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一方面又对国内时局的发展忧心忡忡。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到了重庆，使各方面人士既十分意外，又异常高兴。毛主席抵渝以后，大概是九月份的一天，邓颖超大姐领我一道去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这次会见，使我充满激动之情，终生也难忘怀。那是在重庆求精中学的一间屋子里，设备非常简朴，毛主席、周副主席见我到来，热情地和我握手。我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讲了一些重庆的情况。毛主席、周副主席非常注意地听我讲述，并且不时插话，对我们在重庆的各界人士给

予热情的关怀和鼓励。我说：蒋介石这个人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在谈判中上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亲切地以不同的语言告诉我，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是有准备的，叫我和朋友们放心。这次谈话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真是不可分离的亲密战友。

毛主席到重庆以后和国民党谈判了一个多月，在这一段时期里，周副主席是非常辛苦的。在重庆的各界人士经常从总理那里获得谈判进展的情况，周副主席还亲自征询各界人士对于谈判的意见，亲切周到，令人感奋。周副主席通过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这件事，在和各界人士接触交往中，以他独到干练和雄辩的口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作了卓越的宣传工作，在重庆的中外人士一致称誉周副主席是最精明、能干和最有远见的政治活动家。他吸引了当时聚集重庆的爱国民主人士，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影响。在以后的旧政协会议和政治谈判中，周副主席更进一步显示了他的革命胆识和卓越才能。

我没有参加旧政协会议，但却是参加旧政协会议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的顾问。张澜先生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沈衡老是代表团的成员，我作为顾问，随时了解政协会议进展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表同情，对蒋介石反动派的阻挠破坏异常愤恨。旧政协会议以后，谈判继续，但终无成效。在那个时期里，我常有机会见到周副主席，面聆他的亲切动人的讲话。记得那时，每隔一两个星期都有一次聚会，是在“特园”（鲜特生家里）开的，参加的是各党派的朋友。大家见面，是为了促进民主团结事业，张澜先生、沈衡老等都是经常来的。周副主席常常抽空来和大家见面，分析形势，指明方向。他的乐观的感情，坚定

的信心，亲切的态度，使我们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受到无比的感动和巨大的鼓舞。

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旧政协闭幕了。旧政协通过的各项决议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希望。但人们的希望却被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化作一盆冷水。蒋介石反动派一面假惺惺地参加旧政协，和共产党等各方面人士达成了各项协议，暗中却是以旧政协会议作为缓兵之计，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当时重庆早就流传许多预示不祥的小道消息，这些小道消息后来终于完全证实了。暴露得最清楚的，就是旧政协闭幕十天后发生的校场口事件。也正是在这一事件之后，我和周总理有了进一步的接触，而周总理的教诲则对我以后的政治生活起了决定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市各界人士在校场口广场举行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的大会。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政协决议的实施，继续其反动的法西斯专政，竟然出动大批特务和打手五百人捣乱会场，殴打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我也是主席团成员之一，亲眼见到特务分子大打出手。他们卑鄙之极，竟用钉有钉子的木棍猛击李公朴头部，还有其他同志也受了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校场口血案。当时郭沫若、施复亮、李德全等都参加了大会主席团，对国民党这种做法极为愤恨。周副主席闻讯赶来，怒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行径，并在现场作了紧急安排。当时会场已经陷入一片混乱，我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周副主席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把我拉上他坐的汽车，说：“我们赶紧到医院去，我已经叫人把公朴送进医院了。”我们到了医院，公朴的头上脸上都已包扎。总理慰勉大家要镇静，继续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这时周副主席对我说：你是律

师，你可以代表受伤的人向法院起诉嘛！我立刻就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时我才知道，参加大会的一部分工人已经抓住两个凶手。这两个人说，他们都是临时受雇的，共有五百人，每人可以领到一笔钱，外带一碗面条。这两个人还说出了雇佣他们的指使人，我听了十分气愤，当天就去法院找到姓方的院长，声明代表当事人起诉。那个姓方的院长听到这件事，听都不敢听，但也不得不受理。第二天开庭，我代表被打伤的李公朴等控诉特务行凶的罪行，法庭旁听席上挤满了听众，审判官在通过例行的验伤传讯等手续以后，把那三个指使人判了几年徒刑就算了事。我感到很失望，事后把法院判决经过报告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镇定地说，法院当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起诉的目的，只不过是利用敌人的法庭，对敌人的罪行进行揭露罢了，斗争还长远得很。通过这个事件，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开始懂得敌人统治的法庭，是不能制止国民党反动派行凶作恶的。

校场口事件以后不久，国民党举行了中央全会，正式撕毁政协决议，接着又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卑鄙地暗杀了李公朴先生和爱国诗人闻一多教授。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决心挑起内战之火了。果然，就在同一年的十一月半，蒋介石召开了伪国大，最后关闭和谈之门，周副主席也就离开了国民党统治区而到延安去了。临行之前，周副主席把中共代表团住所（上海马斯南路的一所房子）委托民盟代管。他乐观地说：我们还会回来的。

中国历史就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是在上海迎接解放的，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以后就来到北京，再次见到了周副主

席和邓颖超大姐，这次是在胜利和欢乐的气氛中见面的。我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之前，周副主席曾征求我对新政协人员组成的意见。我说：旧政协我没有参加，基本上没有妇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协能够注意到妇女代表名额。周副主席笑着说：这个意见很好，新政协是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担任了司法部长，直接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从此和总理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其中，最令我感动的事情之一就是周总理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始终关怀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工作。每念及此，热泪沾巾，哀痛之情确实是难以表达的。

我从四十年代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工作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可以说，民盟的一切重大的进步政治活动都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解放以后，民盟举行过几次大会，每次会议都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对于民盟和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对于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学习与工作，周总理时时关心，并经常给予指示。记得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兴建的时候，我曾和陈叔通先生一道去请示周总理，总理就指示我们要不断努力，加强学习。他说，革命形势是发展的，思想要跟上形势就必须学习，学习也是革命。后来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把文化俱乐部这个爱国民主人士经常开会学习的地方称作“革命工厂”，就是根据周总理的上述指示精神。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之一是党与非党的关系。在毛主席发表了这个重要讲话之后，周总理结合实际又作了一次十分精辟的论述，全面阐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中的统一战线原则，深刻地讲解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思想，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启示。

一九六四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四届政协同时举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总理再次深刻阐述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说：“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过程，就是逐步改造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过程。”在林彪、“四人帮”对统一战线横加破坏，对民主党派肆意污蔑之后，我们重温总理的教诲，更有亲切之感。民主党派虽然从它的历史看，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三十年的改造和实践，已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民主党派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依靠力量中的一个光荣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坚信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周总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亲切教导，从思想上、理论上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把民主党派的工作做好，正确发挥党的助手作用。

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作为一个长期受到总理教育的党外人士，我一定要永远遵照总理教导，不断学习，努力工作，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作出尽可能多尽可能大的贡献。

(一九七九年)

学习《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引起的回忆

史 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在近年来又有了新的的发展，这个新的发展，不仅是指它的范围更加扩大了。而且是指它在新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出现了新的代表人物和新的工作方针、工作作风。当然，从最根本的方面讲，是由于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任务。人们普遍感到，不仅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而且就统一战线来说，也是最好的时期之一。

联系群众，团结各方面人士共同进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是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决定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然后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胸怀，又是它的历史地位决定的。但这决不是说无产阶级能够自发地具有这种伟大胸怀，而是经过先进分子的倡导，尤其是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倡导。我们早就从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身上感受到这种伟大的胸怀，而当读了新出版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以后，再一次从他的感人风格中受到鼓舞，得到振奋。

《文选》正象编者所说明的那样，大部分没有发表过。但其中却有很多篇，是曾亲聆的，其中《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

议人员的讲话》就是在解放之初，我们亲自聆听过的。这次重读，启发甚多。当时听这讲话的时候，对许多事情理解还不很透，现在重读，却理解得较深较透了。这也许是这许多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对于无产阶级政策，有了较多了解的缘故吧！

周恩来同志的这篇讲话，在民盟历史上是一次极端重要的讲话。那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距共和国成立才两个月，大陆上一部分地区还没有解放，战争还在继续。民盟的负责同志分别从全国各地集中到北京来，就象当年桃园三结义在古城重聚时的那样，彼此是亲切、感动而又不完全了解。许多事情被提到久别重逢的同志们面前，那气氛令人难忘，有重见的兴奋，也有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开得很长，会期长也反映了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在这个形势下，应民盟的邀请，周恩来同志“站在战友的地位上就有关大的问题”讲了他的看法，这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音。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同志的这次讲话不仅帮助民盟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中央委员之间对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了共同的认识，增进了团结，而且对于民盟在全国解放以后新形势下的工作，起了重大的指导、推动作用。

周恩来同志在这篇谈话里，讲了好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民盟历史上的问题。盟史上的一些问题一直到现在，还在盟内外许多研究盟史问题的同志们之间争论不休，重读此文，却感到有许多问题早就在原则上解决了，只是学习不够没有充分理解就是了。周恩来同志说，到解放前为止，民盟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建立民主政团同盟到旧政协召开以前。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民盟开始表现得很动摇，后来逐渐好转，开除了青年党。这个阶段结束得好，在开除青年

党以后，大多数人团结起来走向进步，正象周恩来同志所说，这个时期的“民盟是在动摇中前进”“民盟当时的宣言、纲领是好的，一些先生在重庆、成都、昆明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也是好的。这个基本的政治倾向应该加以肯定”。第二个时期，是民盟代表以后参加旧政协到停止活动。“这个时期民盟联共反蒋，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发动内战，整个时期是好的。但民盟停止活动，有点遗憾”。这点遗憾“即便是策略，也使人感到不可理解”。民盟在旧政协时期同中共遇事合作，不参加伪国大，知道民社党不可靠还拖着它，直到它坚持参加了伪国大才最后和它破裂，把它开除出盟。这个时期民盟总的方向是好的。表方(张澜)先生打电报指出，民盟无论如何不交名单参加伪国大，可以说民盟的进步性发扬起来了，这是不能抹煞的”。第三个时期，“是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成立总部。沈钧儒、章伯钧二位先生重新树起民盟的旗帜，领导工作，大家一同努力奋斗。”在政治上“一面倒”，“倒在新民主主义方面”。“从总的政治倾向看，民盟在这一时期，原则上是正确的”。正象周恩来同志所说。“整个说来，民盟所经历的三个历史时期是向前进方面发展的，它团结了知识分子走向进步”。“民盟的历史就是在各位领导人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国人民拥护和我们党支持之下发展的历史”。“应该看到，在整个中国革命中，民盟是发展的、前进的，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

在这篇重要讲话里，周恩来同志还讲了其它许多重要问题。在讲到民盟的性质和任务问题时，他说：“民盟的成员，有很多是革命职员，也有来自封建阶级的，来自资产阶级的，而大量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民盟这个集团天然就是联合性

的，它应该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走向进步的联合性的政党”

“民盟的作用就是要团结、教育自己的成员走向进步”。在讲到盟内先进与后进的问题时，他说：“过去民社党和青年党在盟内的时候，是有右派的，但是经过民盟内部的协商，已经把青年党和民社党清除出去。所以到了三中全会之后，民盟内部只存在先进与后进的问题了”。又说：“先进的不要骄傲，后进的也不要懊丧，除去少数冥顽不灵的以外，人总是要觉悟的，只不过有觉悟迟早的区别”。这些讲话，不仅在当时对于我们民盟同志是极大的鼓舞，现在说来，仍然是十分亲切的。

在这篇讲话里，周恩来同志还谈到了思想改造问题和组织问题，真诚、恳切地说了许多战友之言。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还说：“要善于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一切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扩大矛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些讲话中所表达的深刻思想，至今仍然对我们是十分有用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出版是统一战线的一件大事。我希望民盟的同志们和我一道，好好学习这本书，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同时还要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伟大的革命胸怀和处理复杂事物的科学态度，而他的诚恳待人的作风，更是我们要以之为范，师式永久的。

“吾生尤好石，谓是取其坚”

——我所知道的沈衡老

沈钧儒先生字衡山，我们大家都叫他沈衡老。我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就认识他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但我和沈老熟悉起来却在一九三五年以后，那时，他已经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了。

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平凡的年代。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十万学生举行大罢课，接着上海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要求抗日救国，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次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引起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从此救亡运动遍及全国，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却顽固推行卖国政策，取缔一切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五年爆发了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矛盾进一步激化起来。在这个形势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从此，我就追随沈衡老之后，参加了爱国救亡运动和后来的民主运动。沈衡老从爱国老人到成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始终是我的战友、同志和领导人。可以说，我的一生的政治生活都是和沈衡老的领导帮助分不开的。

斗争生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从“七君子”事件开始的。这个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最肮脏的政治迫害事件之一。我们七

个人，除沈老外还有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和我，无端地被投入了牢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和声援。沈老在整个事件中，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当时，社会舆论一片同情，但也夹杂着反动派的噪杂叫嚣。沈老写了一首诗，表明他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置个人命运于度外的胸怀。时苏州监所四围老树甚多，每天早晨鸦群争吵，而庭际却又鹊声清脆，沈老借这情景写道：“昔读忠愍诗，吉凶各有辞；今乃同时至，将何决此疑？吾人重自信，真理终不移！俯仰了无愧，鸣噪一任之。”沈老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革命事业的。在“七君子”事件中，国民党反动派先逮捕了六人，同时贴榜通缉我。为了嘲弄敌人，我曾化了妆在国民党政府通缉令的招贴下拍过一幅照片。后来，当我把这幅照片呈示给沈老的时候，沈老大为高兴，象小孩一般呵呵大笑，并把他写的上面那首诗读给我听，他的纯朴感情使我深深感动。

沈老心灵上的纯朴和他生活上的俭朴是一致的。说也凑巧，自从我认识沈老以后，从重庆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我们的住所一直临近，所以我对他个人生活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沈老生活的俭朴，是一种习惯，正象有的朋友所说，是出于自然，毫无矫饰之处。沈老待人接物，平易近人，也是出于自然。正因为此，他能团结人。他的诚恳的态度，和蔼的风貌，和他整个做人的纯朴浑然一体，引起人们的尊敬。

但是，最受我尊敬的却是他在政治上的立场坚定和爱憎分明。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以后，我们为了集合各方面的力量，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国民参政会内各方人士活动的基础上，酝酿成立中国

民主政团同盟。参加政团同盟的有所谓三党三派，但救国会却遭到青年党的反对，他们攻击说，救国会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而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的应声虫。沈老听到这个话，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光荣的。这样斩钉截铁的答复，对于那些自称独立而后来终于投靠国民党的群丑们，是多么光明磊落、义正词严的驳斥呀！在那样的年代里，这种回答又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终于在次年接纳了救国会和沈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沈老和救国会的同志们继续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一九四六年，他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了旧政协，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又一场艰巨的斗争。

抗日时期的重庆，进步人士和国民党的斗争是在各条战线上进行的。抗战初期，沈老曾和一些同志一道办过《全民周刊》，后来又积极支持韬奋办生活书店，出版进步书刊，宣传抗日民主，此外还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沈老的政治态度始终鲜明，政治立场始终坚定。记得皖南事变以后，在一次文化界的集会上，斗争十分尖锐。参加那次集会的除了进步文化人以外，还有国民党人。国民党特务预先作好布置，有意要为难沈老，但沈老毫不畏惧，镇静地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大声疾呼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的阴谋。到场国民党特务一哄而起，顿足拍桌，乱作一团，但沈老早有思想准备，面对群丑，仍然从容不迫地把话说完，表现了坚定沉着的风度，使在场国民党人也惊讶不已。旧政协会议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破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校场口、沧白堂事件。到场特务大打出手，十

几个特务在捣乱会场后跟在沈老后面，辱骂叫喊，沈老也是镇静自若，不为所动，以坚定沉着的步伐，走自己的路。很多青年群众看到这个情况就拥到沈老周围加以保护。沈老这种临危不惧的态度，给了青年人以莫大的教育。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决心扩大反人民的内战，进一步对进步人士施行迫害，民盟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在当时情况下，有些人同意解散民盟总部，停止民盟活动，沈衡老领导着一部分民盟中央委员坚决反对。沈老是很少发火的，但记得那一次也发起火来。在这一场尖锐的斗争中，沈老又一次表现了他的坚定和勇敢。为了坚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他，终于秘密离沪赴港，在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民盟的罪行，坚决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而斗争。这次会议是民盟历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他在秘密赴港前夕，曾和我见面，在仓促中，他不仅把赴港后的打算告诉了我，还要我留在上海，继续坚持斗争。当时他说：“存初，你要知道，在反动派面前，不仅要勇敢，而且需要坚持！”沈老的话是多么语重心长呵！后来，在上海解放前夕，当国民党反动派向我和同志们进行种种迫害时，我常常想起沈老这一宝贵的指示，它成了鼓舞我坚持斗争的力量。

解放以后，沈衡老的心情是无限欢欣的，他经常面露笑容，因此我们常说，沈老越活越年轻了。他热爱新中国，热爱毛主席，一九六一年，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为了表达他对党、对毛主席的爱戴，曾亲笔抄录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呈献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他是在广东从化休养期间书写的，当时他一

面书写，一面赞叹毛主席的伟大，写一首，赞一首，那兴奋的情景，至今令我难忘。他还经常鼓励大家向毛主席学习，他每次在会上讲话，总要提到向毛主席学习，鼓励大家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不断进步。

沈老喜爱石头，他的书房里陈列着各种石头，有些是他自己拣来的，有些是朋友们赠送的。他都一一标记，注明拣自何处或何人所赠。他的书房因此称为“与石居”，郭沫若先生特地为他题了字。在重庆时，沈老的身后经常有“尾巴”跟随，那时我们都把盯梢的国民党特务称作“尾巴”。抗战胜利后，沈老离渝返沪，在离家的那一天，“尾巴”仍然照例跟随，他们发现沈老有一只箱子很沉重，硬要打开检查，其实却是一箱石头。沈老爱石头如他自己所说：“吾生尤好石，谓是取其坚”，正象征着他在政治上的坚贞。

沈老在政治上是个坚贞不屈的人，但在生活上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有一次，他的次子来京与沈老同住了一个时期以后，回到成都去了，但很久没有来信。一天，忽然来信了。他非常高兴，即时作了一首诗。诗曰：“家书一一字，嵌入老人心，珠泪满窗前，值抵千万金。”那时我的家就在他家隔壁，他特地跑到我家来，把这首诗念给我们听，我望着老人欣喜的神态，深深感受了他那激动的心情。

另一件事也是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九四五年我的老母去世了，在万分悲痛中，沈老来慰问我，并带来了亲笔手书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大幅挽词，写着：“为大众之母，遗天下以慈”，使我感到莫大的鼓励和安慰。

沈老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也是不断进步的一生，如

果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古话来形容他，我想是决不为过的。

我个人和沈老还有一段历史渊源，那就是我们和上海法科大学的关系。我是一九二七年从法科大学毕业的，沈老恰巧是在次年即一九二八年做了法科大学教务长，只差一年，我就会是沈老的学生。虽然如此，沈老仍然是我的老师。因为无论在政治上，在为人上，或是在法学研究上，沈老都是我所崇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沈老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我任司法部部长，我们又在法律岗位上共事。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沈老也是有一定贡献的。这使我想起他为上海法学院某届毕业纪念刊写的一首七绝，中有“古今几个真堪说，名法家与政治家”之句，沈老其相宜乎？

沈老是一九六三年六月离开人世的。就在这一年的元旦，敬爱的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祝寿的宴会上讲了话，其中说：“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周总理对沈老的评价确是很恰当的。沈老逝世以后，朱德委员长对沈老的逝世非常哀悼，他也写过一首诗来纪念沈老，诗是：“享得高龄九十年，几经争斗把身翻，勤研马列传真理，立德立功又立言。”这首诗也是对沈老的恰当的评价。我尤其喜欢它的最后一句，因为沈老的确是做到了立德立功而又立言的。

(一九八〇年)

向着明天

——怀念韬奋

我和韬奋是在三十年代救国运动中认识的，他的年纪比我稍长一些，但在我印象中却比我要小。这是因为，他干事业的精力总是那样旺盛，他待人的态度总是那样热情，他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年轻。

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不平常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主要精力用于反共反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日益尖锐，一切有爱国良心的中国人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无不同声愤慨，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等刊物，在黑暗中呼喊出了广大人民闷在心底的呼声，强烈呼吁团结御侮，抗日救亡，向人民指出了光明的所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上海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从事爱国救亡运动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诸先生和我。后来我们被同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韬奋他们六个人被关在一处，我单独被关在女监。虽不关在一起。但却总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通消息。韬奋不仅是极有正义感和事业心的友人，同时也是一个很机灵的人，在监狱里，我所得到的的一些消息，往往都是从韬奋那里通过同情我们的狱卒递送过

来的。

爱国有罪、救亡坐牢，这个不能容忍的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当时进步的和中间的舆论界也给予我们以强烈的支持，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恐慌，他们通过一些处于中间的好心人和我们商洽出狱的“条件”。这个“条件”是要我们从监狱转到反省院，然后再从反省院释放。意思十分清楚，这是要我们承认爱国有罪、反省有效，才教育释放。我们在“家长”沈钧儒先生领导下商议，宁愿坐穿牢底，决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严正拒绝了那个荒谬不堪的“条件”。韬奋对于这个所谓“条件”异常气愤，象在别的事情上一样，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崇高气节。

“条件”没有谈成，我们继续坐牢，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西安事变在党的英明决策下通过各方面协商努力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我们才在党的营救下，在全国人民强烈呼吁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声浪中，从苏州监狱里释放出来。

韬奋一生的事业是办刊物，办书店，写文章，宣传进步文化。我不仅是他在爱国救亡运动中的同志，同时也是他主办的几个刊物的热心的读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里，办刊物、办书店都不容易自主，而韬奋办的刊物和书店却能依靠自己的业务维持，并且蒸蒸日上，其主要原因是，他所办的《生活》、《大众生活》等刊物和生活书店所出版的书籍，反映了时代的动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因而深得读者的欢迎和爱戴。一种文化事业只有办到这样的程度才能算是群众的文化，只有群众的文化才富有生气，不致萎靡不振，无病呻吟。韬奋一生事业的成功，固然和他个人的勤奋有关，也和他始终与群众声气相通有关。我还记得他办的刊物上有《读者信箱》一栏，人们经常提出

各种各样的问题，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韬奋的解答总能抓住事情的要害，从思想上给予指导，难怪在生活书店被封以后，收到无数读者的慰问信。他一直生活在广大读者群众的支持与鼓励中，从来也没有寂寞过，即使身在囹圄，他也不是被隔绝的。

提起生活书店被封，使我回忆起一件事情，那是一九三〇年的一个夜晚，韬奋匆匆忙忙地到我的住处枣子岚垭“犹庄”来，告诉我说，生活书店各地分店一个一个被封，人员被捕，他正在到处奔走，但那些国民党官老爷们都是互相推诿。这样下去，他的全部事业就有被摧残以尽的危险，更重要的是这样下去，进步文化将受到严重摧残。被捕人员还不知下落如何。他问我，还有没有别的门路可以想办法？我自告奋勇地说，以我和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关系，可以去找一下指导长宋美龄试一试看，当晚说定，第二天就到宋美龄家里，当我向宋说明来意以后，宋推说这事他不了解，要问一下“老头子”，并留我午饭。近中午时，蒋介石回来了，穿着一双拖鞋到她房间里来，一见我就装着很讲礼貌的样子，要退出去。宋说，正要找你。于是蒋介石就坐下来，我向蒋介石当面又谈了一下生活书店被封和人员被捕的事，并告诉他，书店被封，人员被捕，社会上都很不安，这对团结抗战是很不利的，蒋介石装做“愕然”的样子，说：竟有这样的事么？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要查问！一定要查问！我当时以为这位国民党最高负责人一口应允查问，事情大概好办了，回来以后就告诉韬奋。但在这以后，封店却继续被封，人员继续被捕。到了一九三一年初，除了重店以外，各地分店都被封闭干净了。这是蒋介石流氓手法的又一次表演。在这个情况下，韬奋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定秘密离渝，走向更广阔的斗争。临行前的一个夜晚，韬奋

匆忙到我住处，讲了几分钟的话就离开了，说是要到隔壁一个巷子张家花园去看望一下黄任之先生，我只能祝他一路顺风，向着明天。他走了，这是我和韬奋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悲愤和沉痛的气愤中见面的。后来从其他朋友那里陆续得到他的消息，知道他经过几次转折，最后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四年秋冬的一天，吴玉章先生派人到沈钧儒先生和我这里来，告诉我们关于韬奋因患脑癌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的消息，同时转告我们，根据韬奋生前的请求，党中央已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沈老和我一面为韬奋的逝世而悲痛，一面又为他被批准入党而庆幸，韬奋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斗的一员。他的战斗的一生反映着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而终于找到光明，找到真理的全部历程。正象陈毅同志所说：“他是以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入战场，伟大的革命实践推动他向前迈步、直至与共产主义相结合。”

今天是韬奋逝世三十五周年，缅怀既往，感奋有加。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转折的历史年代，我们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还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它建成现代化的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前途是任重而道远，充满激情和希望。在这新的斗争开始的日子里，我们向韬奋祝愿。我们一定要踏着韬奋的足迹，在永远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向着新的更加灿烂光明的明天。

（一九七九年七月）

纪念杜重远烈士殉难四十周年

著名社会活动家，爱国知识分子，战争的文化工作者杜重远烈士殉难四十周年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来纪念他。

重远同志是救国会的老同志，我和他相识是在三十年代初期。那时邹韬奋同志主持的《生活周刊》因发表同情福建人民政府的文章而被勒令停刊，重远同志受《生活周刊》同仁的委托，以《新生周刊》的刊名继续出版。不但继续了《生活周刊》鲜明的立场、犀利的文锋，而且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使刊物和群众运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印数也随之上升。它高举战斗旗帜，在黑暗中呼喊出亿万人民抗日救亡的心声。杜重远的名字也就闻名国内外。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步步进逼，蒋介石却步步退让。重远同志竟因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中提到日本天皇在宪法上的地位而触怒了日本人，被捕入狱，这真是千古奇冤。此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国民党文化管制的无道，更反映了国民党媚敌苟安、围剿革命的政治反动。重远同志为爱国救亡运动历尽艰辛，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重远同志是东北人，与张学良同乡。他因触怒日本帝国主义而被捕入狱，在东北军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九三五年末，张学良赴沪，秘密与社会见，以国事相征询。重远义无反顾，慷慨陈词，向张学良提出张杨合作，联合中共，形成大西北大联合

局面，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政治主张，使张将军受到极大启发，后来重远同志又介绍高崇民同志与张深谈，使张被进一步触动，终于在周恩来副主席鼓励下，经过延安会谈（当时延安在东北军控制下，周副主席于一九三六年春亲赴延安与张学良谈判），提高了认识，为日后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提供了准备。

一九三九年，重远同志到新疆去，亦是在他的“大西北大联合”的政治信念支持下，才接受盛世才的邀请而去的，不料盛世才竟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人物，在一九四〇年盛决心投蒋反共以后，即对重远同志和其他进步同志残酷迫害，最后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下了毒手。从受迫害起一直到遇难，重远同志始终坚持战斗，不与反动分子妥协，不愧为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无畏战士。重远同志的死难，是当时中国民族苦难的一个象征，也是当时中国革命形势转折的一个信号。

从那时到现在，四十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这四十年间，中国和世界都有极大变化。尤其是中国人民政权之建立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变革之巨大，是亘古所未有的。社会主义长风万里，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四化必成，中华必兴。此诚可告慰于重远之英灵者。

重远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所曾参与的，以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同志为前导的爱国救亡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时刻，在国内外阶级矛盾复杂交错的形势下爆发的一场中国人民要求生存的政治、社会斗争，它曾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其后，形势发展了。但这个运动的基本原则却始终为人们所记取，并贯串于以后的群众运动中，这就是党的领导，人民的广泛团结和卓有成

效的文化宣传活动，这些活动推动着人们的觉悟和社会的进步。
革命的道路是艰苦的，但我们的信念永存；人民必胜！

(一九八三年)

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

——回忆李公朴同志在重庆的斗争事迹

三十三年前，中国政治史上出现了一次震惊中外的事件，这就是李、闻血案。国民党特务分子以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法，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两位在人民中享有重望的知识分子开了枪。李、闻两烈士的牺牲，不仅开创了政治斗争中灭绝道义的空前记录，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大的侮辱。这一事件是一个历史的信号，表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即将进入一个你死我活的新阶段，也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日暮途穷，正在走向最后的覆灭。

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我和李公朴先生更熟悉一些，这不仅是因为公朴先生抗战前就在上海一带工作，而且是因为从三十年代救亡运动开始，我们就已经是同志，并在“七君子”事件中共同度过国民党的监狱生活。现在，回忆起他一生为救亡、民主运动而作的革命斗争，真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在抗日战争期间，皖南事变以后，公朴先生大部分时光在昆明。他在昆明，参与了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的创建，坚持了昆明地区的民主运动，以大部分时间从事团结知识分子，团结广大青年和各界人士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同时他还坚持进步的文

化出版事业，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扼杀文化事业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到重庆是在一九四五年秋天。大约在重庆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又回到昆明，而这次回昆明不久，就被蒋介石的特务用无声手枪所暗杀了。

一九四五年秋天，公朴先生来重庆，是为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民盟刚由政团同盟改组为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民主同盟不久，尽管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文教界知识分子和职业青年在人数上已经很多，但由于历史关系，它的领导机关却仍然保持着政团同盟时期的结构，尤其是青年党这个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右翼政治团体还把持着民盟总部的部分机构。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着民主运动的开展，广大盟员对于这种状况是不满意的。当时重庆支部、成都支部和昆明支部是盟内三个最大的支部，因此在大会前夕，我们对于昆明代表寄予很大期望。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先生都是那次大会的昆明代表，但闻先生等因另有工作，未能与会。这次会议不仅在民盟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在民主运动史上也是一次重要的事件。

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是与当时的形势分不开的。当时的形势是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而中国向何处去却还是一个未定之局，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发动内战来扑灭进步力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民盟身上，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中间人士寄托着希望。不管他们对中国和世界有着多少不同的看法，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统一战线的口号，也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中间人士在政治上的迫切要求。因此，在盟内清除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青年党的影响，把民盟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向前推进一

大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李公朴先生在这场斗争中不仅和昆明的代表一起向倒退的保守的意见作斗争，他还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广泛接触交换意见，团结了更多的力量，使顽固的青年党代表十分孤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态度和蔼，广交朋友，善于求同存异，也善于从大处着眼，又有组织才干，所以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他是社会活动家，各方面人都能联系，能沟通文化界和职业青年团体，把各方面的民主力量组织起来，尤其是在团结青年方面，作用更加显著。这也说明他的政治责任心很强，能自觉地发挥他的长处，为民主事业尽心尽力，死而后已。

民盟的那次大会是十月召开的。其后不久，也就是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四十天左右，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镇压民主运动，创造了骇人听闻的昆明一二一血案，动用军队封锁学校、冲进学校，镇压反内战、呼吁和平民主的群众集会，用手榴弹、刺刀屠杀学生、教师，师生死难四人，受伤六十余人。这是抗战胜利后不到半年之内，国民党反动派犯下的严重罪行。当时，重庆各界十分震惊、愤慨，认为是国民党好战派蓄谋彻底破坏《双十协定》的阴谋，也是他们发出的要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的信号。重庆各界并没有被昆明血案所吓住，都在想办法要大力支援昆明的民主斗争，既要揭露国民党法西斯血腥暴行，要求惩办凶手和主使人，也要继续扩大掀起反内战的民主斗争。公朴先生在重庆，此时他心情特别沉重，因为他与昆明的青年和战友们有深厚的战斗情谊，他和他们在昆明是一道为民主而斗争的。他焦思苦虑，深入到重庆各界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征询意见，深入到民盟青年支部和重庆青年群众团体中去和青年们共同研讨如何以实际行动来声援、支持昆明的斗争。他当时是民盟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副

主任委员，终于想出了办法，争取了各界的大力支持。民盟多数常委经过研讨也决定出面坚决支持，而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也正是在这时期迅速筹组成立的。十二月九日至十一日，重庆各界决心突破国民党的镇压、封锁和白色恐怖气氛，非常迅速，非常成功地组织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重庆各界追悼昆明一二一死难师生大会”。追悼大会在重庆市长安寺内举行，到会有各界人士和群众二三千人，各界又公祭两天，人山人海，轰动了山城。在广大群众中公开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和法西斯暴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心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内战，反暴行，争和平，争民主的浪潮，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惶失措。由于各界迅速行动，并特别机警，会场地点临时互相口头通知，所以在开会当天，已经突击布置好会场时，国民党反动派才知悉，匆匆派来十多名警官，慌慌张张地看了一下会场，未敢破坏就都溜走了。这次反内战的追悼大会开得挺成功，公朴先生在组织、联络和疏通意见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各界发起举行追悼大会的通知，就是公朴先生和民盟青年支部的同志在一起研究制订的。公朴当时虽不在昆明，但他在重庆也是全力投入支援昆明的民主斗争的。

公朴愤激之下，写了一幅悼念一二一烈士的挽联：

耍独裁残杀学生之政府从来没有好结果

反内战代表人民的公意不久一定会成功

他在救国会会员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对国内外政治形势作过一番较详的分析，并在《联合三日刊》上发表了《人民才是原子弹》的文章。特别是他在《知识青年》上发表的《从世界看一二一惨案》一文，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民主与反民主势力的激烈斗

争，从世界说到中国。他说：“不论在西方或东方，法西斯的残余力量还不少，法西斯的思想，还潜伏在这个角落，那个角落，还若隐若现的在这儿那儿冒出来。你看……在一切可以滋生法西斯细菌的土地上，那些法西斯游魂，还会得意洋洋地在舞动。”接着他就谈到中国，政治上玩了一套还政于“民”，实则是还政于“党”的把戏之后，就在军事上想凭藉美军、敌伪军来完成武力统一的迷梦。屠杀人民的人还嫌用美机扫射人民不够彻底，正天天想借几颗原子弹来华北大陆“牛刀小试”一番。而一些无耻的政客们则唯恐天下不乱，大声喊叫“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刻在形成中”，手摇鹅毛扇，装腔作势念念有词地说什么：“战迟则胜少而祸大，战速则胜多而祸小”。其居心险恶是可以概见的。你讲言论自由，他讲打人自由。你讲开会自由，他讲开枪自由。不仅在马路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抓人、打人、杀人，还可以自由地到学校去投手榴弹，打不死还加上几刺刀。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真相，也就是一二一惨案所以发生的原因。这些原因，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个地方事件而不与全世界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联系起来也是很危险的。最后他说：“近百年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写照清楚了。反人民的人，用武力压迫人民的人，一定为人民自己的力量所推倒。”

我还想起在旧政协召开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重庆沧白纪念堂举行多次大规模的民主集会的斗争。那是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尖锐斗争，是只许政协会议成功，不许政协会议失败的斗争。每天举行“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到会报告当天开会情形，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这些民主活动声势很大，很热烈，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民主，反

对内战独裁，切望政治协商会议开得成功的意愿。对开好政治协商会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协进会是由民主建国会、陪都文化界协进会筹备会和救国会三个团体发起邀集各界代表在一月十一日组织成立的。公朴先生和许多同志都是协进会的理事，轮流主持每天召开的民众大会。公朴和罗叔章、曹孟君等同志又负责组织联络的工作。我们知道，沧白堂的民主集会，差不多每次都是和国民党特务暴徒的捣乱破坏进行尖锐的斗争，要用较高的“艺术”和努力才能维护每次集会的顺利进行。

当时，公朴和主持多次集会的同志一方面坚定地排除特务的捣乱破坏，使会场恢复正常，一方面要保护政协代表安全，防止暴徒突然袭击，而他们自己则是首当其冲，毫无畏惧地和上百的特务暴徒面对面的斗争，依靠到会群众的斗争支持，一次次地把特务暴徒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使大会不致中断而得以进行。他们维护的不仅仅是会场的正常进行，而同时是维护人民群众斗争所换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他们维护的是人民的希望——《双十协定》的执行。

我们知道，旧政协得以召开，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来渝和国民党谈判的结果，也是全国人民向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果实。当时，中国人民确实是对这次会议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寄以很大期望的，而国民党反动派却采取两面手法，表面上承认协议，实际上阴谋破坏。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所发生的“校场口血案”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全面破坏政协协议的一个极可耻的前奏。

校场口是重庆市内的一个广场，为了庆祝旧政协的胜利，重庆各界人士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会，参加会议的工人、

店员、学生、职业青年、各界人士很多，重庆市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也都参加了会议。这是一次希望和平团结的大会，也是一次民主力量的检阅。李公朴先生以很大的热情参加这次大会的组织工作，不愧为卓越的组织家和群众工作者。国民党特务知道这次大会和公朴先生的关系。他们受其主子的派遣，为了破坏旧政协通过的各项协议的实施，妄图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在大会开始以后，就大打出手，制造事端。那些打手们首先就对公朴先生行凶。同时受到殴打的还有郭沫若、李德全等先生。公朴先生伤势最重。特务行凶是以木棍钉上铁钉作武器的，当时他被特务打得血流如注，全场秩序大乱。周副主席闻讯赶来，在现场作了紧急安排。我正在秩序大乱中不知如何是好，周副主席一把把我拉上他的车子，同去医院。公朴先生见到周副主席去看望他，非常激动，连说不要紧的，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他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为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那时就已给我深深的感动。

公朴先生出院之后，就和民盟的另一位领导人陶行知先生积极筹办社会大学。那是在尖锐斗争时期而创办的革命学校，他担任副校长兼教务长。这个学校聘请了不少有名的学者教授在校讲课，在短期内培养了不少青年，社大多数学生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时就参加了革命。通过社大教学实践，他探索了教育改革的一些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研究。社大同学会所编《社会大学》一书，应该再版，以提供关心教育者参考。公朴在抗战前是办的国难教育、职业教育等，在抗战时是办的抗战教育，在抗战后是办民主教育。他是一个民众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的基本点是面向群众，面向实际。他的教育内容是：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组织教育，人格教育。他的教育方法是强调：

教，学，做，用合一，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同提高相结合。

在办社会大学的同时，公朴先生继续从事群众工作，特别是青年工作，当时重庆有一个民主青年联谊会的青年组织，全部是职业青年，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公朴先生常和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交往，给了他们以亲切的指导和政治的鼓舞。当时联谊会中的许多青年人，后来或者到了解放区，或者在重庆坚持民主运动。其中很多人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这一方面，公朴先生也是有一份功绩的。

李公朴先生是一个活跃的人，在各界人士民主运动的各项活动中，几乎到处都有他的形踪。在重庆文化界的活动中，公朴先生也是很活跃的。正象他所自许的那样，他属于民主运动，他要为民主运动贡献他的一切。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他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份离开重庆的，七月就在昆明被国民党暗杀了，他实现了为民主运动而死的誓愿。他的死在当时唤醒了千千万万诚实的中国人，帮助人们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

公朴先生遇难以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夫人张曼筠女士。最近有人把它拣出来送给我看，使我更真切地记忆起当时的情景。下面是这封信的原文：

“曼筠姊：当我听到公朴被刺殒命的消息，我真无法压制我内心的悲痛和愤怒！这是公朴为民主努力的代价吗？这是民主国家应有的德政吗？不！但这也可可见公朴有巨大的力量，足以动摇那些反民主的势力，他们才不惜用最卑下、最惨酷的手段，来暗算他，杀害他。其实，他们只能暗害他的身体，无法消灭他的精神。显然的，反而激发了千千万万的，过去还未做到象公朴一样

的努力，现在却愿意踏着他的血迹，继续前进了！看那千千万万不相识者的慰问、吊唁信，就可证实。谁都有死，谁都逃不了一个死，难道用‘死’就能吓倒人吗？就能镇压一切吗？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同志被那反民主的恶势力杀害，固然免不了感伤；可是要杀，他们是杀不尽的，战斗的活力反而增长得更快。这是从古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曼筠姊，你相信吗？你是有认识有理智的女子，你要认清公朴的死，固然残酷，可是这也说明他在民主斗争中是最有力量的一个。他是在民主斗争的战场上阵亡的，他的光荣、壮烈的死，是有代价的。他将比他活着更有力量。他是要永远在人们心上活着的！曼筠姊，你是他的妻子，你比任何女子都光荣！你千万不要过于悲痛呵！你要载着他的荣誉、踏着他的血迹，加倍努力前进！才不辜负他。我们一班朋友，也誓死继承他的遗志，永远伴你在一块。”

三十多年过去了。公朴先生的夫人张曼筠女士也已作了古人。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却正在茁壮成长。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三十年来，尽管我们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成就是伟大的，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励精图治，万象更新。三十年前黑暗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今天的光明的新中国。我们还要继续前进，为“四化”而奋斗。缅怀既往，悼念烈士，我们感想万千，却又充满胜利的信念。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任何人也阻挡不住。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生命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还将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可以告慰于先烈，也是有以自励而奋发有为的。

(写于一九七九年秋万山红遍时)

纪念邓初民同志

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知名的民主教授、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邓初民同志，在他过满九十一岁生日以后的几个月，离开了我们。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损失，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损失。

邓初民同志出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前夜，那时，辛亥革命还没有发生，多难的中国正处在“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局面已经打破了，国家富强之策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而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民族灾难却正在愈益加深加重。为了寻找真理，邓初民同志于一九一一年从湖北省石首县的一个农村奔向当时湖北省的文化中心武汉，考入宋教仁当校长的江汉大学。早在青年时代，邓初民同志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从此，他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一九一三年他东渡日本，受到河上肇教授的影响，使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水平愈益增进。

邓初民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是很早的。远在中共成立初期，他就和党的领导人李大钊、林伯渠、董必武等同志有过很多交往，一九二六年，邓初民同志在武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并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讲过课。他一直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到一九六二年，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夙愿实现了。他引用苏轼的词句“谁

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来表达自己的兴奋的心情。邓初民同志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情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版过《新政治学大纲》、《社会进化史纲》、《阶级、阶级斗争概论》等著作，对于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还以口述的方式从事著述。他是一位热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邓初民同志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是很深的。远在民主政团同盟时期，他就参加了民盟的活动。民盟从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以后，他先后当选为民盟重庆市支部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他积极参加民盟的学习和工作，是民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邓初民同志在民主同盟的名义下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活动。一九四六年秋天，毛泽东主席由延安来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全国人民对于这次谈判寄予很大期望，邓初民同志也不例外。但他和许多进步朋友一样，一方面对这次会谈寄予期望，一方面却保持审慎和警惕。并深深地关怀着毛主席的安危，因为大家深知蒋介石是一个极其阴险极其反动的政治流氓。当邓初民同志在欢迎会上见到毛主席时，就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向毛主席说了。邓初民同志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恩来同志，在当时重庆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邓初民同志坚持战斗，作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

旧政协开幕后，邓初民同志积极投入了政协工作。邓初民同志和我同时以顾问身份参与了民盟代表团的工作。记得那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每天晚上，都和顾问一起研究当天会议的进展情况

况，和各方面个别交谈的情况。重庆各报记者则围在我们会议室的周围，打听民盟代表团的政见，情绪兴奋，气氛紧张。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也时时参加我们代表团的会议，并作出精辟的分析。邓初民同志以很大的热情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且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邓初民同志对周恩来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极为钦敬，总是以赞同的态度表示自己的看法，邓初民同志常讲的话就是一一定要对国民党蒋介石保持高度的警惕。

一九四五年十月，民盟重庆市支部办了一个刊物，名称叫《民主星期刊》，邓初民同志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他以相当大的精力办这个刊物。参加这个刊物工作的同志，多系兼职工作人员，因此是相当辛苦的。《民主星期刊》在当时重庆的舆论界，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是民主同盟的喉舌，也是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所有参加者的喉舌。它所反映的政治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文化界和广大青年的心声。刊物编得生动活泼，对于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那时，民盟内部还很复杂，在许多问题上常常意见不一，但主流是好的。《民主星期刊》反映了多数盟员的正确的政治主张。记得在刊物的第三期上，有一篇重要文章，是邓初民同志执笔的，这篇文章与邓初民同志和我都有关系。事情是这样的：昆明的同志们带来一份民盟纲领草案，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讨论。重庆的盟员极为认真地研究这份草案，举行了多次的座谈。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民主同盟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邓初民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在经过一番讨论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民主同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他在文章里说：中国民主同盟最根

本的要求是民主，民主同盟代表着一切要求民主的人们的利益。哪些人呢？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还包括工人农民和学生。只有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反动派的官僚们是不要民主、反对民主的。邓初民同志的这个观点事实上说明了民盟从它开始成立就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在反动派面前，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联盟。

那时，民盟虽然已经不再是政团同盟，但实际上却包括着盟内各党派。旧政协召开的时候，青年党受国民党指使分出去，成立了青年党代表团，其实是国民党的附庸。这时，青年党一个领导人写了一篇文章《从制止内战谈到政治协商会议》在这篇文章里，恶毒攻击中共，说中共“只争地方，不争中枢，多争军事，少争政治”，并诬蔑说：“侧重中枢，还多少有点共同干的意思，侧重地方便是各干各的意思”。邓初民同志针对这些谬论，写了一篇文章，据理驳斥。指出，解放区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区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保护人民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文章写得铿锵有力。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重庆《大公报》也发表了一篇《质中共》的文章，诬蔑中共是内战祸首，《新华日报》于次日即发表了《与大公报论国事》的论文，以大量事实驳斥了它。邓初民同志把这两篇文章同时转载，却加上富于启发的编者按语，教育广大的中间人士。这一期《民主星期刊》，在编排技术上是令人叫绝的。《新华日报》的文章洋洋洒洒，气势磅礴，而那篇《质中共》却有如泄气的皮球，蜷缩在角落里，没精打采，羞无遮处。

当时的舆论斗争，只不过是全面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而实质问题却是中国往何处去？邓初民同志在他写的《新世界与新中

国》一文中直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世界与中国又是紧密相连的，无论是中国的前途还是世界的前途，都要经过斗争，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向旧世界宣战，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中国就必然会到来。

道路是曲折的，旧政协会议闭幕以后，紧接着就发生了校场口、沧白堂特务行凶事件。同年夏天，国民党在全面发动内战的同时，以极其卑鄙的暗杀，夺去了在昆明的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两同志的生命，妄图以此镇压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就在这时，国民党放出空气，要在上海暗杀沈衡老和陶行知同志，在重庆暗杀邓初民同志，这个消息在重庆《新华日报》登出以后，邓初民同志仍然在重庆公开露面，并毫不畏惧地参加了李、闻追悼会，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二中全会，邓初民同志才离开重庆。那时，白色恐怖已经普及全国，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终于最后撕下一切伪装，公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此讯既出，举世震惊。邓初民同志即和在国内的许多民主人士一道，离沪赴港，开始新的战斗。

一九四八年初在港举行的民盟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邓初民同志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以他的笔墨批评了民主人士中仍然幻想第三条道路的朋友们。指出在民主和反民主之间不可能有中间路线，而事实上，作为“中间阶层”内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已经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参加了大翻身的革命队伍，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的广大部分也参加了革命的民主斗争，在这个情况下，要在民主与反民主之外再找什么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事实正是这样，曾几何时，国民党反动派就在人民战争中走到穷途末路。历史正以人民

的名义翻开新的一页。

全国解放以后，邓初民同志情绪振奋，心情舒畅。他先后担任山西省副省长、山西大学校长、历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历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民盟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初民同志的一生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曾口述他的一生经历，感慨地说以下一段话：“数十年的教训，使我深深体会到，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共产党，依靠集体，依靠人民，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才能获得前进的勇气，也才能在革命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邓初民同志的这个感受，是一切要求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我们要向邓初民同志学习，在党的领导下，把知识用于人民，不断地为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